

拉法格著

唯心史观和
唯物史观

王子野译

18702

5034

唯心史观和 唯物史观

拉法格著

王子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五年·北京

П. Лафарг
ИДЕАЛИЗМ И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В ОБЪЯСНЕНИИ ИСТОРИИ

本书所收的三篇文章，系据 1925 年莫斯科出版的《拉法格文集》（三卷集）俄文版译出。其中《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及所附饶勒斯的文章，曾请林穗芳同志按法文原文校订过。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法〕拉法格著

王子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1}{16}$ · 字数 82,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02·214 定价（六）0.39 元

印数 00,001—20,000

目 次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回答让·饶勒斯）.....	1
附：让·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24
卡尔·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	39
懶惰权（駁斥《劳动权》，1848年）.....	79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①

(回答让·饶勒斯)

女士們和先生們!

你們自己明白，把回答饶勒斯的任務承擔起來我不是沒有猶豫，因為這個人的熱烈的辯才甚至使最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原理也飽含熱情。在他說話的時候，我想，當然你們也想：這個魔法師同我們在一起是多麼幸福啊！卡爾莫的礦工，當他們把饶勒斯從大學里拉出來並把他投入政治舞台的時候，已慷慨地向那引導他們的罷工獲得勝利的神會黨付清了自己的債務。

但是你們今天晚上被邀請到這裡來不是參加演說競賽，而是參加思想鬥爭；饶勒斯把辯論提到哲學的高度，假如你們不能要求我有饶勒斯的辯才，然而你們卻有權要求我把辯論保持在這個高度上。我正要這麼做。現在就讓我們言歸正傳罷。

I

笛卡兒學派的哲學家勸告我們在開始討論之前應該先確定爭論的範圍。因此我們就在這裡提出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都知道，所有民族，不管他們的文化水平達到如何的高度，都有一個共同的發展的起點；所有他們的祖先都是野蠻人。

^① 1895年1月12日拉法格對讓·饒勒斯於1894年12月間在巴黎的集體主義者學生小組所組織的集會上就這個問題作的演講的回答。——譯者注

这些野蛮人栖息于森林之内，靠自然的偶然的賜予以糊口，为了比较容易地获得食物，像野馬一样由三十到四十人結成一小群。这些野蛮人怎样能够发展成为文明民族，住在聚集几千、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用煤气和电力照明，用铁路交通，在那些城市里居民分为敌对的阶级和从事无数不同的专业？

这个问题又被另一问题弄得复杂化了。当饒勒斯对你们說所有語言虽然彼此之間极端不同，但是可以归結为同样的語法形态时，他已經向你们指出这另一个问题来了。既然我們談到語言問題，我想給你们指出一个同我們探討的問題有关的現象。所有那些在我們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詞，开始时在創造它們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詞在希腊語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則只作牧場、住宅解。法語的“droit”（法权）一詞在現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語言学的現象难道不應該得出結論：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們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嗎？

饒勒斯在語言中所证实的那种統一也表現在人的精神創造的一切形态里面，即表現在宗教、哲学、文学里面。例如我們的保姆用以激发我們幼年的想像力的童話在地球上的一切民族中間都会遇到，它多半是产生在野蛮或半开化时期；又例如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說，——这是最新的，但不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无例外地在一切資本主义的民族中繁荣昌盛。

各民族的比較史向我們指出他們全都經歷过家庭和政治的同样的形式。公正地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維科（Vico）說，存在着“一个所有民族在一定的时期都要經歷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即由野蛮、凶猛和兽行的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状态。”但是既然不是所有民族都已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于是馬克思补充說：“工业比較发展的国家，不过为那些較为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們自己的

未来的形象。”^①而我国天才的拉馬克(Lamarck)的伟大的学生乔弗罗阿·圣提累尔(Geoffroy Saint-Hilaire)設想过植物和动物构造“图形一致”。

人們、动物和植物的按照同样的图形进化的原因应当在世界本身里去寻找还是应当在世界之外去寻找呢?

自然神論者同伏尔泰(Voltaire)一起毫不迟疑地回答說,有钟表存在就有钟表匠存在,同样的道理,有世界存在就必然有創造者存在。但是問題的这种过分简单的解答野蛮人就已想出来了,并没有解决問題,而只是把問題推开,因为假如世界的存在就預定着創造者的存在,那末这个創造者的存在反过来又需要另外一个創造者的存在;最初几个世紀的基督教的諾斯替派信徒(Gnostiques)曾断言假如耶穌是耶和華的儿子,那末耶和華反过来又是某个不知名的上帝的儿子,尽管野蛮的犹太人禽兽般的卑鄙的情欲玷污了他。自然神論的解释什么也不能說明,不能滿足科学工作者。不管你打开一本什么样的科学的书籍,你任何地方也碰不到上帝的名字。化学家、生理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不求助于关于上帝的便利的假設来解释他們所研究的現象,而力图完全靠物质的特性来解释这些現象。每个学者都从他自己的科学領域中驅逐上帝,而这甚至也发生在他需要用上帝来解释不属他的研究的專門領域內的現象的場合。既然历史还不是科学,那末历史家就常常求助上帝,以便找到解释那些他不能找出原因的現象的钥匙。馬克思从上帝的最后的避难所,就是从历史中把上帝驅逐出去。而正是我們利用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我們就能創造出科学的历史。

饒勒斯曾部分地采用黑格尔的唯心的理論,黑格尔并不认为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I頁。

上帝先于世界存在；相反地，在他看来，上帝存在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在他看来，观念的存在先于一切，不过它一开始是采取原子的形式。当自己同自己发生矛盾并同自己的对立面结合时，它创造了第一个合题，这合题反过来又成为正题和反题，然后再成为合题；而这第二个合题又成为新的三段论式的出发点，如此类推。这样自动地发展起来的观念获得了外在的表现，产出与自己相似的世界。

饒勒斯沒有向后退得这么远：他使用柏拉图的方法，柏拉图把在分析观念和划分观念的等級时，溯源到善的绝对和最高观念。饒勒斯在把我们这些文明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加以分析和分类时，并没有达到正义和博爱的绝对观念，而达到它的最小的表现，他把它放进野蛮人的头脑里去，在那里这观念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但是当它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并与之进行斗争，直到矛盾解决为止；因此，历史不过是不间断的冲突的系列，总是以正义的观念的胜利告终。

我对饒勒斯的理論的第一个异议是这样的：它不能解释世界，因为并不是什么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在指导着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机体的进化，而现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整个宇宙。

其次我向饒勒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停留在野蛮人的头脑上？为什么不再降低一级而到动物的头脑里去找寻观念？牧羊狗或看家狗有明显的责任感和很清楚地认识自己过错的能力。你们会对我说，这些责任观念不是狗本身固有的，而是被人灌到它的脑子里去的。但是须知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例如水牛和乌鸦也有它们自己的责任感。公的水牛让自己被杀来保护母的和牛仔，而充当哨兵的乌鸦细心地观察四周围的动静，给那些安静地在啄食农夫播种的谷粒的伙伴预报危险的到来。

因此在动物中也能找到饒勒斯认为在野蛮人头脑里是无意识

的观念的有意識的形态。但是为什么要停留在动物身上，而不在細胞所由形成的无定形的原形质中寻找原子状态（如果我可以通过这样表达的話）的观念呢？細胞是有机序列的出发点，而人則是有机序列的最高成就。

我还要問饒勒斯：为什么限于寻找道德观念，为什么不从事科学观念的起源的研究？为什么不自問一下，那个只存在于几千化学家头脑里的原子論是否不以无意識的状态潜伏在沒有头脑的牡蠣身上？为什么不同唯物主义者一样說：一切应当存在在一切中間，因为思想归根結柢只不过是一种物理—化学的現象，只不过是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已？但是这种說法并不能为我們說明人腦中的观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饒勒斯对我們說，視觉和听觉是高級的感觉，因为有視觉和听觉的动物都能享受自然的和諧和太阳的光輝；手有可以同其余的指头相对的大姆指，是猿猴和人的最有特征的器官，他竟把这些感觉的作用放在手的作用之上！手創造了人。但是可以这样回答他：視觉和听觉归根結柢只是触觉的局部化和特殊化，沒有眼睛的动物就用自己的整个皮肤的表面来感受光綫，甚至連植物的細胞也只因为太阳的作用才产生叶綠素；这一切說法沒有向我們說明感觉器官是怎样形成的。

正像你們所見，饒勒斯和我們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爭論归結为关于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爭論。过去哲学家研究过这个問題，将来还会有哲学家研究这个問題。

笛卡儿认为我們生下来就帶着一般、原因、效果等等的先天观念。最初是洛克，后来是孔狄亚克以及感觉論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智中所有的一切首先存在于感觉中。狄德罗說，理智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自然的現象在它上面留下印記。在思想王国的入口处碰到的希腊人已經爭論过观念的起源問題。柏拉图认

为我們的关于正义的概念是絕對的善的概念的回忆；而苏格拉底的先生阿克拉于斯(Archélaüs)說，你在其中生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是道德概念的泉源。实际上可以确定，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奴隶制被法律承认，人們带着最敏感的良心曾經心安理得地同奴隶制和睦相处。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回到阿克拉于斯和洛克的論点，可是要作点补充，假如文明人不能准确地确定他究竟在什么时候获得某些观念，那末它們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給他的；它們是靠我們祖先的經驗获得的，我們从我們的祖先继承了經過許許多多的世代鍛炼的腦力，以致我們可以說是自发地获得某些观念，因此它們對我們來說好像是先天的。

II

人和动物之所以能思想只因为有腦子；腦子把感觉变成观念，正像发电机把传给它的运动变成电一样；是自然，更确切地說，是**自然环境**（这是为了不学十八世紀哲学家那样使用那种会把自然理想化为形而上学的实体的說法）造出腦子和其它器官。我故意說“和其它器官”，因为唯心主义者使腦同其它器官分开以便使腦的活动，即思維，服从于类似巫术的原因，正如唯灵論者把人从动物界分出来，以便把他描写成神奇的有生之物，上帝为了他下降人間并让自己被釘上十字架。

創造了人的器官和人腦的自然环境使它們发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它們具有最不寻常的和惊人的适应能力。例如，基督教徒和文明人在許多世紀以来从非洲沿岸掠夺黑人，并把他們販賣到殖民地当奴隶。这些黑人是半开化人和野蛮人，比文明人的文化落后几千年，然而他們在很短时期內就能学会文明人的手艺。

耶穌教徒在巴拉圭曾作过一次社会的試驗，就我所知这是最著名的一次，它对于我們社会主义者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明显地证明，一个民族一移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就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耶穌教徒，这些无比的教育者和精明的劳动剝削者把十五万以上野蛮人訓練成为文明人。

他們把瓜拉尼人 (Guaranys) 安置在巴拉圭的居民点里，这些瓜拉尼人赤身露体在森林里游蕩，他們用的武器只有弓和木棒；因为只知道最原始的农业，他們只种玉蜀黍；他們的智慧是这么不发达，以致他們只会数二十个数，并且还得靠手指：一个手指表示一，两个手指表示二，一只手表示五，一只手加上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表示六，两只手表示十，两只手加上一只脚指表示十一，两只手加上一只脚表示十五，两手加两脚一起表示二十；二十以上就太多了。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的野蛮人常常靠手指和脚指来計算。因此，数，这个存在于文明人的头脑中的最抽象的概念，最初在野蛮人的头脑中是有形物的反映。当我們說或想一、二、五、十时我們并不看任何物件；而野蛮人却要看一个手指、两个手指、一只手、两只手^①。在阿拉伯数字輸入之前如此长期地被文明民族使用的羅馬数字是模仿手的形状而来：I 是指一个手指，II 是指两个手指，V 是指三个中間的手指屈下而大姆指和小指伸直的一只手，X 是指两个 V 或两只交叉的手。由此也可看出以上的說法是多么正确的。

耶穌教徒把巴拉圭的野蛮人变成能担任最复杂的工作的熟练的工人。这就是沙列烏阿 (Charlevoix) 談到他們的話：

“传教会中的印第安人有最高的模仿才能。例如，只須把十字架、蜡烛台、香炉指給他們看，他們就可以立即复制出来，并且他們

^① 文明人的小孩子在計算数目时像野蛮人一样往往也想到有形物，这也是常有的事。

的仿制品与原模型很难分得清。他們只要看一看模型就能制造出自己的乐器，最复杂的风琴、地球仪、土耳其式的毡毯和手工业的最复杂的产品同样也能制造出来”①。

博物学家阿耳比尼(Orbigny)在1832年訪問了在驅逐耶穌教徒之后而陷入崩潰和破坏的居民点，在看到这些野蛮人所修筑的并有繪画和雕塑裝飾的“中世紀式的”教堂时赞叹不已。

但是，所有这些技艺和美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对于野蛮的瓜拉尼人的手和头脑來說并不是先天帶來的，它們可以說是装进去的，正像維尔第②的咏叹調可以装进手搖风琴一样。由于接受了耶穌教徒的教育，他們才能获得了这些技艺和这些不同的概念。在这里就給我們提供了人对人直接影响的范例。但是，难道对人的器官和脑子就沒有其它的改善方法嗎？难道社会环境的現象，难道經驗不会发展人的器官的技术能力，不会改变他的思想嗎？

照饒勒斯所說的无意識地沉睡在野蛮人头脑中的那个正义的概念，只是在私有財產产生之后才钻进人腦中去。

野蛮人沒有任何正义的概念；他們甚至沒有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概念的字眼；他們至多知道同等报复法——以打击还打击，以眼还眼，它归根結底只不过是变形的反射运动，即当有物威胁眼睛时，每次都迫使我們的眼皮閃閉，当每次受到打击时，就迫使我們的肌肉收縮。甚至生活在高度发达的但私有財產还只是刚刚萌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环境里的半开化人，也只有十分模糊的正义的概念。关于这个問題，我引用梅因(H. S. Maine)的意見，他的意見的高度的哲学价值大概饒勒斯也不会有異議的。

梅因說：“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印度的乡村里既沒有权利，也沒有义务。一个受損害的人，不申訴个人所受的損害，而是申訴整个

① 沙列烏阿，《巴拉圭的历史》，巴黎，1757年。

② 維尔第(Verdi)，十九世紀意大利大作曲家。——譯者注

小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再者，习惯法没有得到承认。——在不服从村议会的决议的偶然的场合，唯一的惩罚，或者说唯一的可以肯定的惩罚，看来也只是一般的谴责。”^①

洛克像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样使用几何学的演绎方法达到一个结论：私有财产产生正义观念。他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一书中明确地说了以下的话：“凡是沒有财产之处就沒有非正义，这个命题正如欧几里德的任何定理一样正确，因为财产的概念意味着对物的权利，而与‘非正义’一词相适应的概念则意味着对这权利的侵犯或破坏”。

假如正义的概念像洛克所说只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后才能出现，作为它的产物，那末盗窃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說，对你所需要的或你所希望的东西的本能的占有欲，则相反地在私有财产产生之前就已很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正如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对待精神财富一样；他们，照莫利哀的说法，看到哪里有财富就向那里去取。但这种自然的习惯一到公有制被私有制代替之后便成为盗窃、犯罪。

公有制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那些概念和感情，在资产阶级基督教徒（这是私有制的可悲的产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赫克威尔德(Heckewelder)，摩拉维亚(Moravie)的传教士，在十八世纪曾在北美洲那些当时尚未被基督教和资产阶级的文明所腐化的野蛮人中间生活过十五年之后說：

“印第安人相信大神(Grand Esprit)創造了世界和其中包含着人的共同的幸福的一切；他使土地上生殖居民，使森林充滿野兽，他这样做时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而是为了一切人的幸福。一

^① 梅因：《东方和西方的村公社》。

切东西給予一切人共有。在地上呼吸和在田里生长的一切，在河里和水里生活的一切都归一切人共有，因此每人有权享有自己的一份。

“好客在他們中間不被认为是美德，而被认为是不容推却的义务。他們宁願餓着肚子去睡觉也不願因忽視自己的义务，未能滿足外地人、病人、穷人的需要而受到非难，因为后者与一切人一样有权得到公共基金的援助，因为野兽（假如在森林里被捕获，就用来款待他們）在被猎人捕获之前是一切人的财产，因为給他們提供的蔬菜和玉蜀黍是在公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耶穌教徒沙列烏阿也在尚未受过基督教的和有产者的道德的美德教育的野蛮人中間生活过，在他的《新法兰西历史》里也是这么說的：

“紅种人的博爱精神无疑地有一部分可由野蛮人还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些如圣約翰尼斯·克利索斯托姆斯(Johannes Chrysostomus)所說的冷酷的字眼来解释。他們对孤儿、寡妇和体弱多病的人的关心，他們的如此惊人好客不过是他們相信一切都应当共同属于一切人的結果”。

私有财产在**我的和你的**之間造成差別时，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引起正义的概念，而且也給人心灌輸种种感情，这些感情扎根如此深固，以致我們把它們看作是先天的，如果我把它們列举出来，就会使你們吃惊。毫无疑问，当人們还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时，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嫉妒，什么是父爱；那时男子和妇女一样，实行多偶制，妇女想要多少丈夫就可以要多少，男子想要多少妻子就可以要多少。可是旅行家告訴我們說，所有这些正直的人比无聊的和利己主义的单偶制家庭的成員生活过得更滿意更和睦。但是从私有制确立时开始，丈夫为自己买妻子，保证以生男育女的妇女来专供自己享乐。嫉妒是所有权的一种变形的感情而已。而

父亲耽心将来有没有儿子只是从他私有财产可遗传的时候才开始的。

充满文明人头脑和建立在“我的”和“你的”这两个概念之上的正义概念，只有到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时候才会像恶梦一样归于消灭。

饒勒斯对我们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的概念和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

正义的概念并不与社会环境的现象相矛盾，反而与它相适应。

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实证主义者，断言说正义和道德的概念是在不断进步中。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工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但是难以赞同被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其他同样空谈玄理、眼光短浅的深思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如此喜爱的这种正义和道德的逐渐进化。

许许多多的事实反驳了这个得意的理论。在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里，在那里靠奴隶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家庭的消费，经营商业受到莫大的鄙视，西塞罗（Cicero）说：“商店里还能出什么好人吗？”只有被鄙视和可鄙的人才做金钱的交易。那时有息借贷等于盗窃，要受到道德和宗教的谴责。耶和華本人就曾禁止犹太人贷款收息，只有对被认为是敌人的外地人，才能允许使用这种方法。现在已变成资本家的利益百般效劳的奴仆的天主教教会过去曾经宣布高利贷罪该万死。但是这种道德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时起就变了。贷款收息

变成了神圣而又神圣的事业；1789年革命后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宣布利息的合法性，而在以前利息只是被容忍而已。公債的大帳簿成为金书——资产阶级的聖經。高利貸者、銀行家的职业成为可尊敬和被尊敬的；靠食利，亦即靠金錢利息生活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成員最大的奢望。

因此，有息貸款就成为道德的高级形态，如果不是康德、斯宾塞和其它正义和道德的“可改善的至善境界”的崇拜者所說的最高形态的話。做金錢交易的資本家在这問題上同意自己的惊人肤浅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見，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们这些希望消灭资本主义剝削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承认封建領主和古代希腊羅馬的貴族对道德的見解略胜一筹，因为那时候他們把高利貸者看作窃賊。

假如正义和道德是不会前进的，那末它們終归要适应統治阶级的需要和利益，随着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历史时代而发生变化。馬克思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里說：“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嗎？任何一个时代的統治思想都不过是統治阶级的思想。”^①

适应統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正义和道德被統治阶级强加于被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終于接受它們，虽然它們与被压迫阶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相对立的。

我們誰沒有听到工人們說过：“須知老板应当从自己的資本取得利潤”。所有的无产者，不論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全都这么想。工人——利潤的牺牲者——承认它的合法性，从而使資本主义的剝削神圣化，資本主义剝削每天从他們手中夺去他們所創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使雇主得以从自己的資本取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8頁。——譯者注

得利潤。

被压迫階級开始形成自己的要求不是用較高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而是用流行的正义和道德的名义；它要求的只是适应压迫階級利益的正义所承认的权利。举一个历史的例子：

人們說在好战的社会里劳动是被輕視的；这并不完全确实。《伊利亚特》的英雄們放牧自己的畜群和耕种自己的田地；他們常常以能耕出笔直的犁沟而自豪。羅馬的貴族和希腊的世襲貴族放下劍和盾就拿起犁头。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当他們在某一貴族家庭里充当侍卫和仆役时，就开始了騎士的訓練。在这些时代受輕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的出卖。出卖自己的劳动和由此而取得工資的人就这样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像奴隶一样出卖自己，于是就失掉自由人的身份。但是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人天天都采取这种使自己地位下降的行动。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只关心一件事：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出卖思想这个神圣的东西。塞克西士(Zeuxis)^①贈送自己的画是因为，像他所說，甚至用波斯王的全部黄金也不能偿付它們的价值；而我們的梅松尼埃(Meissonier)^②之流則把自己的画廉价卖给芝加哥的养猪商或麦凱(Mackay)之流，他們往往把它們扔到厕所里。

无产者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理想：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公平的劳动日，公平的工資”——这是全世界工人的工会的口号。无产者只有当他們不能按公平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才发出怨言。只有当資本家階級的有損尊严的和污辱人格的正义不能兌現时，工人階級才开始想到反抗。

① 公元前五世紀——四世紀时代的著名的古希臘的画家。——譯者注

② 十九世紀法国画家。——譯者注

III

自然环境已把人锻炼到这样的程度，使他們既能在溫度达四、五十度的赤道上，又能在水銀可以冻结的两极附近生活得很好；不錯，老鼠也有这种卓越的能力。自然环境的不同就把人类分为彼此不相似的种族。

但是人，也像螞蟻、海狸和其它的动物一样，为了自己的生活，創造了人为的环境，即人工的产物。这个人人为的环境繼續自然的事業；它改变自然的人，使他的品质的一部分得到改善，压抑其它部分和創造出社会的人；此外，它还抵消自然环境的差别化的影响并恢复人类的統一。

在同一緯度上的自然环境有差不多相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經濟生产方式相似的人为环境在人們的风俗上、在他們的家庭的和政治的組織上、在他們的宗教和哲学上都表现出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凡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在寒冷的加拿大和炎热的意大利，甚至在新开发的澳大利亚地区，——到处都能碰到議會制(先是建立在限制选举上，而后又为普选所代替)，到处都能碰到被通奸軟化了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自然神論的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这种类似不仅在那些許多世紀以来經過同一社会发展道路的民族中間可以观察到，而且在欧洲的运动范围以外进化的、飞越一些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种的民族中間也能观察到。例如日本人一旦輸入机械工业就一跃而由先前的封建制度进到資本主义制度；他們因此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法律、甚至自己的服装；他們已戴上我們这种駭人的高頂大礼帽，請你們相信，很快他們就会有自己的巴拿馬帽和自己的卢維埃(Rouvier)。

因此，人靠着他所創造的人为环境的帮助而成为自己的社会

命运的創造者和主人，但是他的活动是无意識的、和他的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据黑格尔說，人常常达到他所看不見的结果，而这结果又是同他的意图相反的。例如資本家为了增加自己階級的財富而采用和发展大的机械工业，一点也沒有想到他們在破坏小生产的同时，也破坏作为他們与无产阶级之間的緩冲物的中等階級。在1848年国民自卫軍从巴黎附近的城市大批大批赶到巴黎，屠杀参加六月起义的“共产主义者”，保护貝萊尔 (Péreire) 和富尔得 (Fould) 之流，而正是这些貝萊尔和富尔得后来在财政上絞杀他們。但是在1871年，尽管梯也尔 (Thiers) 一再号召，沒有一个国民自卫軍去参加反对公社的斗争，当时只有我們的总統費利克斯·富尔 (Félix Faure) 先生来报到；他从哈佛带来了一个水泵，去熄灭凡尔賽分子放的大火。当吞并小資产階級时，金融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也把自己的最好的保卫者吞下去了。人民的智慧已了解这个历史規律，并用自己的一個諺語把它表現出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場合下，經濟生产是天。

是經濟的必然性而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观念引导人类前进。奴隶制的历史最明显不过地說明这一点。

据唯心主义者說，奴隶制有这种双层的幸福：它是从博爱中导引出来的，又因博爱而消灭。——自从对邻人之爱启迪了他們的心智的时候起，人就停止吃自己同类的肉；然而把邻人吃掉就是爱他的最好的证明；天主教徒认为他們所能給予上帝的爱的最大证明莫过于以圣餅的形式把他吃掉。

实际上，吃人肉的宴会的停止只能归因于經濟的原因和妇女的影响。最初的时候，全部落的人——小孩、妇女和男人——都参加这种宴会；他們吃掉某一个年老的亲属，为的是把他从衰老和野蛮生活的煩惱中解脫出来，这种生活对于那些失掉了力量和肌肉的弹性的人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当定居在野兽和魚类丰富的地

区，牲畜的飼养和土地的耕种創造了供养老年人的可能，使他們得以終享天年。可是人們还是繼續吃戰場上打死的敌人的尸体以及战俘的肉体。参加这种人肉宴的只限于战士，妇女則被排斥。无疑地，正是因为妒嫉的緣故，妇女开始对人肉发生厌恶并且也开始以厌恶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参加人肉宴的男人；男人們因为受到妇女的輿論的影响，終于废除这些宴会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天主教徒的圣餐就是人肉宴的一种紀念。

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別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

当野蛮的和半开化的部落由于自相殘杀的战争而人口显著减少时，他們就收养战俘来补充自己战士的队伍；如今他們收养他們，为的是迫使他們为自己劳动。这种收养奴隶的办法甚至还保留在文明民族中。希腊人和羅馬人在家庭祭坛前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就把奴隶收入家庭之內。奴隶甚至把自己的名字給予家庭；家庭(famille)一詞源出古奧斯克語“famel”，意指“奴隶”。父权制家庭实际上是建立在妇女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

奴隶制在开始时带着溫和的性质；人們看待奴隶像看待同伴一样，差不多是看作朋友。阿薩拉(Azara)，曾充当葡萄牙和西班牙領土的划界委員，他在上个世紀曾在巴西和巴拉圭的野蛮部落中住过十多年，得有机会观察奴隶制度的初生形态。

他写道：“門巴牙人(M'bayas，巴拉圭的最好战的部落)使用瓜拉尼人充当仆役和讓他們耕地。的确，这种奴隶制帶有非常溫和的性质，而瓜拉尼人心甘情願地服从使喚。主人很少指定工作，任何时候也不使用强迫命令的口气，与奴隶分享一切，甚至肉体的愉快也是一样。我看見一个門巴牙人冷得发抖，但是仍让他的瓜拉尼人盖他的被子；門巴牙人甚至不让人看出他想要回自己的被

子。”①

如像《奧德賽》給我們所描写的那種奴隸制雖然還顯出主人同奴隸之間的友誼關係，但是已經失掉自己當初的人道的性質。而當文明不斷前進時，當哲學啟發人們時，當正義對自由公民的權利起調節作用，而道德以清規戒律來防止他們的惡德時，奴隸制就越來越成為非人道的，而在雅典和羅馬的鼎盛時期它就變成不能忍受的了。

可是甚至最有理想的哲學家也不反對非人道的不能忍受的奴隸制度。柏拉圖把奴隸引入自己的烏托邦的共和國，而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然預先指定某些人要當奴隸。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凶神則指定哈姆（Cham）的後裔提供奴隸。但是耶和華預感不到的東西，希臘的思想家卻預見到了：當機器轉動並且像烏爾甘（Vulcan）②的三腳架一樣自己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務時，奴隸制就要消滅。

天主教的牧師，他們在研究神學中汲取了扯謊的技巧，不厭其煩地反復宣稱基督教已經廢除奴隸制。而事實上正是基督教把奴隸制帶進美洲和使它在舊大陸保存下來。聖保羅曾把逃亡的基督教奴隸送還他們的主人，並且像聖彼得、聖奧古斯丁以及最初幾個世紀那幫聖徒一樣向奴隸說教，說他們只有服從地上主人和忠實地為他們服役，才能邀得天主——奴隸主和暴君的天生的庇護者——的惠愛③。

哲學和基督教從來都沒有想到同奴隸制度作鬥爭，更沒有想到消滅它。但是生產工具一旦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使奴隸制已成

① 阿薩拉（Don Felix de Azara），《1781—1801年南美洲旅行記》。

② 古羅馬人的火神和金神。——譯者注

③ 假如天主教的牧師為了欺騙社會輿論而公開譴責奴隸制，那末他們在神學課的私人講授中則保護它。

五十年前故世的耶穌教士古里（Gury）曾寫過一本《道德的神學》，它是經

为对人的剝削的靠不住的和賠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拿雇佣劳动制同奴隶制比較一下。奴隶主必須买自己的奴隶并在他生病和死亡的場合承担一切損失；他在奴隶生病和在不劳动的日子里必須养他；他还必須操心他的养老問題，因为不能像狗一样把他杀掉。資本家解脫了所有这些操心的事。他不用解囊，要多少工人就可以得到多少工人。他付給工人的工資大体相当于奴隶主为养活他的牲畜所花的錢数。巴黎的公共馬車公司維持一匹馬的費用比一个馬車夫的工資还要多，而他們的四脚的奴隶所做的工作却比他們的自由的雇佣奴隶要少。

为什么无情地剝削自由的男女工人的資本家会成为废除奴隶制的热心的战士，这不是用好心腸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說明的，这只有用經濟理由才能說明。

不仅統治階級，而且被压迫階級也认为正义和道德所贊揚的奴隶制是神圣的和自然的制度。古代社会的不幸的奴隶甚至預見不到消灭奴隶制度的可能性。奴隶制窒息了他們心中一切反抗的感情，正像它阻碍一切正义观念在主人头脑中产生一样。例如在北美南北战争时征集不到足够数目的黑人来組成反对他們的压迫者的軍隊。

典著作，所有的神学生都人手一册，按照巴黎大主教基貝尔(Guibert)的評語，它“近三十年来成功地改造了法国的宗教界的心灵”。古里在这本书里說：

“問：人是否可以有对别人的所有权？”

“答：1)人按照自然法可以当作有用的财产永远卖给别人。因为假如他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把这财产轉让给别人，他就可以永远轉让它，因为他可以出让他所占有的东西。

“2)奴隶制或永久的从属，同自然法在原则上是并不矛盾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們把自己的全部劳动让给别人，是为了換得食物。”

(古里：《道德的神学概說》，第二章《财产的原則。——論正义和权利》)

耶穌教士古里作为精明的邏輯学家，他从雇佣劳动和自然法中引出奴隶制。他的論点在一切卫护資本家階級或承认某种自然法存在的人們看来是无可辯駁的。

中世紀的情形就不一樣。封建主只有用不斷鬥爭的方法才能把自己的統治擴大到全國：他們必須把暴動一個接一個鎮壓下去和把生活在集體主義的農村里的農民對平等和獨立的渴求淹沒在血泊里。請聽十世紀的農民的這個反抗的呼聲，請告訴我你們是否聽過更豪邁的呼聲：

“主人對我們無惡不作；他們占有一切，享用一切，一切都干得出來，而使我們生活在貧乏和痛苦之中……為什麼允許他們這樣對待我們呢？難道我們不和他們一樣都是人，我們也有四肢，也有身體，也有病痛的感覺，——而我們是以一百個對付一個……讓我們起來保衛自己反對騎士，讓我們團結在一起，任何一個人就不能奴役我們，這麼一來誰也不能阻止我們砍伐樹木和在樹林里獵取野獸，在河里捕捉魚蝦，統治樹林、沼澤和牧場的只是我們的意志。”^①

農民們為了表達平等的渴望並不需要等待 1789 年的資產階級。但是穿着獸皮和毛織的斗篷和用棍棒、鐮刀武裝起來的貧苦農民如何能對付得了那些穿着鎧甲的封建主呢？在法國、英國和德國，他們到處都被打敗，慘遭屠殺，備受折磨，——所有這些都是在僧侶和資產階級的援助和參與下進行的。資產階級的英雄埃蒂安·馬爾舍(Etienne Marcel)（自由派和急進派的共和主義者，在巴黎市政廳對面豎立了他的塑像），在利用參加扎查雷起義的農民之後又出賣他們，把他們交給壞蛋查理(Charles-le-Mauvais)^②之手。

但是火藥一走出煉金術士的實驗室，並進入工業的領域，它便

① 《盧的故事》(Le roman de Rou)。據說這部書產生在九世紀或十世紀(這部書又名《諾爾曼人的英雄事跡》，系十二世紀盎格魯-諾爾曼詩人 Robert Wace 所作。——譯者注)。

② 指十四世紀殘酷鎮壓扎查雷農民起義的納瓦爾國王查理二世。——譯者注

恢复了战场上的平等并宣布封建制度的死刑；但是当火药把欧洲从封建领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锁链——常备军。

资产阶级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虚有其表的军人，它为不分民族差别地剥削一切人的雄心壮志所鼓舞，宣布一切民族的博爱并声称在它的社会统治之下将出现和平和商业的统治。为了加速这种和平统治的到来，欧洲资产阶级的大活动家建立了“国际和平联盟”；他们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大会还派遣代表到各国国王和专制君主那里去向他们述说战争的恐怖和列举出消耗在维持常备军队的巨额款项来恐吓他们。这些正义与博爱的使徒，当他们看到欧洲常备军的数目日益增长，战争日益成为大规模屠杀的战争的时候，终于不免感到失望。于是他们决定装扮成热烈的爱国者；假如他们现在在宣传了他们的博爱福音之后没有号召各国人民互相残杀，这是由于恐怖；今天有产者也免不了成为炮灰。

人们可以像埃米尔·奥利维埃（Émile Ollivier）那样轻松地投票赞成侵略达荷美的亚马孙女人或马达加斯加的荷瓦人的殖民远征，因为派往那里去送命的只是农民和工人；但是在欧洲战争时，有产者自己必须参加战争和付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件事他们是完全不喜欢的，特别从改善的武器和新的炸药使战场变为几平方公里的非常大的屠场之时起，在那里几十万人不光荣地和不英勇地死去。

屠杀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事实上一次欧洲战争势必把一切健壮的男人都征召入伍；工厂都要关闭，谷物在收割前就烂在地里，没有耕过和没有播种的田地不会打粮食。在这样的战争——不管哪一方胜利都一样——之后交战国双方的人口减少，面包缺乏；武器落入工人之手。布朗基（Blanqui）说：“谁有枪，谁就有面包！”。一次欧洲战争将会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革命。

只有蠢人或罪犯才会希望欧洲战争。破坏工具的发展和改善

以及全民軍事化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了；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废除常备軍的时刻于是来到了^①。

但是經濟現象比资产阶级的意志更有力，不允許实现它的理想。目前保留着常备軍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促进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假如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想废除軍隊，那末服务于軍事的一切工业就要破坏，在劳动市場上一下子就会抛出三十到四十万青壯年；这就会引起普遍的失业，这就会引起社会革命。

假如可怜的资产阶级也偶然有过合理的理想，从它取得社会統治之时起就力图付諸实现，那末就在这里可以看出，由它自己发动起来的經濟力量是反对它实现自己的願望的，并向资产阶级表明，它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它必須服从經濟界的力量。

IV

理想在人的头脑中已經活了几千年。这不是正义的理想，而是和平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理想里沒有我的和你的之分，在那里一切属于大家，在那里平等和博爱是把人們联合起来的唯一的紐帶。在动乱的历史时期，高尚的思想家——柏拉图、莫尔、康帕內拉——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描繪为令人心醉的烏托邦，英雄們为了它的实现而起来斗争，不惜牺牲性命。

这个理想不是人腦的自发的产物，而是关于宗教告訴我們的那个黄金世紀，那个地上乐园的回忆；这是关于人們在达到私有财产之前所必經的那个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久远的回忆。我曾引用过的赫克威尔德和沙列烏阿的报告书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曾經有过

^① 拉法格这一段的論断充滿和平主义的幻想，是不正确的。列宁曾經指出：只要社会还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认为在资产阶级会自动废除常备軍是不能想像的。——譯者注

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假如希腊城市的穷人和平民为恢复财产公有而发动的许多次反对贵族和富人的暴动失败了；假如中世纪的异端的民众的教派恢复世上的平等和博爱的多次试图失败了，那是因为在希腊和罗马崩溃时期也罢，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也罢，经济关系都不允许恢复财产公有；它们不但也不想恢复财产公有，反而致力于破坏共产主义的最后残余和准备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因素。

共产主义的理想以新的光辉在我们的脑子里复生。但是这个理想已经不是一种回忆，它是从现实的腹内产生出来的，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像英国的洛拉尔特教派^①和罗马的平民那样；我们是相信科学的人，我们不发明新的社会形式，不过是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引出它们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

我们被谴责制造阶级，恰恰相反，我们要求消灭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迫使人分裂为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经济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亚里士多德这个思想巨人曾预见到当机器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自由的公民便不再需奴隶给他们创造闲暇的可能。而我们则预见到雇佣劳动制这个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末日，因为我们知道人掌握着铁的奴隶——自动的机器。

在古代，在任何历史时期，自由的公民从来没有像我们一样拥有这样多数量的奴隶。

这里有从1890年商业部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摘下来的几个数字。

^① 十四世纪在荷、英、德等国反对天主教的贫民运动。——译者注

1887年法国工业、农业、铁路和水上运输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数目达到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架而提供九百万匹馬力。

按照矿場主管部門的計算，每匹馬力相当于二十一个工人的劳动力。因此，这九百万匹馬力等于一亿八千九百万个奴隶的劳动力。

据1886年調查，法国有一千九百万人，因而每个法国人可以摊到四点八个铁奴隶或者每个家庭以五口人算可以摊到二十四四个铁奴隶。

这一亿八千九百万的铁奴隶的工作由一个不能指揮和控制它的阶级所独占，它在非常的富饒中間創造出生产者的贫困。

但是当生产資料一旦从資本家的懶惰的和无力的手里夺过来而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时，和平与幸福就会重临大地，因为社会使經濟力量服从于自己，正如它使自然力服从自己一样。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人才是自由的，因为他将成为自己的社会命运的主人。

无意識的統治便要宣告寿終正寢。

附：让·饶勒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①

女士們和先生們！

我首先要求你們耐心听，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向你們作的报告是純理論性的。

我还要首先請你們防止可能由下列事实产生的錯誤：我現在要向你們讲的問題在几个月之前我已經談过。^②我当时是按照馬克思的观点闡述經濟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問題；我当时力图证明馬克思的学說的正确，这样就可以显得我毫无保留地拥护馬克思的学說。

这次則相反，我想說明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釋。因为在我的論证的这个第二部分，可能看不到我用来維護馬克思論点的論据的力量，为了不致誤解我的整个思想，我請你們把我們不得不分成两部分的报告互相加以修正，互相加以补充。

几个月以前，我曾經說明以經濟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解釋一切历史現象，我只想提醒一下，經濟唯物主义同生理学的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馬克思很不同意那种认为一切思想或意識現象可以

① 这是饶勒斯 1894 年 12 月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組組織的集会上所作的演讲。——譯者注

② 1894 年 7 月 9 日饶勒斯曾向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作过題为《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演讲。——譯者注

用物质的分子的简单的集合来解释的意见；正是这一个假设马克思和后来恩格斯都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已为科学学派和唯灵主义学派所推翻。

这也不是所谓道德的唯物主义，后者把人的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和个人福利的追求。与此相反，如果你们记得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怎样对待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如果你们记得他怎样以鄙视和轻蔑的态度谈论边沁（Jerémie Bentham）之流功利主义理论家（这些人认为人的活动总是为了他有意識地追求的个人利益），你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学说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如此，两者恰恰是相反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取决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人的个人的行为依赖于社会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威势超过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动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关系，人们互相之间的生产关系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

人们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形式彼此发生关系，决定社会有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道德，决定它的活动的总方向。而且，马克思认为人们进行活动并不服从于某一抽象的正义观念或抽象的权利观念；他们进行活动是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固的和必然发生变化，让位于另一种制度，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为另一种制度所代替，——例如吃人肉制度为奴隶制度所代替——，正是这种代替由于自然适应的关系带来了政治的、道德的、美学的、科学的和宗教的观点的相应的改变；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生活的组织的方式是历史的最紧密、最基本的弹簧。

这种理论之所以取名为经济的唯物主义是因为照它的看法，现成的正义的观念并不是从人的脑子里抽出来的，人只不过在脑

子里、在腦物质中反映生产中的經濟关系。

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相反，它的形态极其多样。我可以概括叙述如下：这就是那样的一种观点，照这种观点，人类从自己存在的最初时起可以說便有模糊的观念、有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发展的最初的預感。

人类还在获得历史經驗之前，还在組織这样那样的經濟制度之前早就有了正义和权利的先驗的观念，他們正是追求这个先驗的理想，进入越来越高的文明状态；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和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

因此观念本身是运动和行动的原則；理性的观念絕不依赖于經濟的因素；相反地，正是經濟因素在现实和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表現，一步一步地体现人类的理想。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尽管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体系赋予它无数的形式。但是，請注意，这两种看来似乎是互相对立的、彼此不相容的观点事实上在現代社会的意識中已經几乎調和一致和融合为一了。事实上沒有一个唯心主义者不同意，如不預先改变經濟組織，人們的最高的观念便不能实现；而另一方面，在經濟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中間也很少这样的人，他不呼吁正义和权利的观念；很少这样的人，他們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只預見到正义和权利的更高度的实现。

在这里有沒有矛盾？馬克思总是力图保持自己的理論的有些严格的完整性，并且嘲笑那些认为向純粹的正义观念呼吁就会增加經濟进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的人；他嘲笑那样的人，据他說，他們“想用一种辯证法的最无形的綫織成的、以修辞的花朵裝飾邊緣和被感伤的露珠湿透的面紗来掩盖历史实际、事实本身。”

我們的任务是探索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能不能調和，事实上

由于社会主义意識的也許是盲目的本能，这种調和已在我国实现。問題在于探索这种調和从理論和学理的观点看来是否可能，在它們中間是否存在着解决不了的矛盾；我們是不是必須在这两种体系中作最后的选择，我們是否可以从邏輯上和从理性上把它們看作同一真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若不联系更普遍的問題，照我的意見，若不证明，認識問題本身今天是如何向人們提出来的，我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特殊問題。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要說明并想证实人的思想四个世紀以来、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努力調和和綜合对立的甚至是矛盾的东西；这是整个哲学运动和理性运动的标志和特点。

文艺复兴时代碰到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不能解决的矛盾：繼續存在的基督教的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但是古代精神与其說是承认自然，不如說是对自然的崇拜和酷爱；而基督教精神則指責和否定自然。

这样，中世紀末的思想家就面临着充滿了矛盾的理性的遗产；他們必須把这两种思潮調和起来和使趋統一。

特别是由于科学思想和实验科学发展的結果，这个問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对自然現象的认真的和积极的研究，力学和数学的运用于自然力量使自然失去它在古代世界人們心目中所具有的那种美丽的魅力和內在的神圣的生活的外貌。

一方面必須把古代世界所理解的那个自然同基督教世界观調和起来；另一方面把新的科学所理解的那个自然，即为純粹机械的必然性所制約的現象的簡單的联系的那个自然同人的精神的自由的意图調和起来。

这首先是笛卡儿，他运用特別巧妙的方法，一开始就像基督教徒一样鎖閉在自己意識的內在生活中，并抛弃外在生活，排除自然，把它看作猜不透的謎。

以证实自己的思想为限，他发现上帝的观念并且因此给意识和上帝指定这种独特的位置，这同否定自然一起构成基督教的特点。

在他这样创造了第一个方法之后，他不像基督教徒那样简单地组织自己的内在生活，而力图确实地认识自然本身；因此当他通过基督教的精神状态时，他只是利用它来奠定实证的科学。

在莱布尼兹的著作里我们也看到使人与自然统一的同样的试图，他说明在一切地方，从纯粹的物质力量到这张桌子，直到我们行走的土地里都有与精神相类似的东西，有着同样的爱美的愿望和美感，在物理学的定律里和化学的化合里有着同样的和谐的、准确的和数学的关系。这是普遍的决定论同普遍的自由的调和。

一方面，他肯定在世界上没有不与其它运动发生无限联系的运动。我现在在空气中送出声音造成的运动是许多先前的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反过来又得到无穷的反应，它不知不觉地震动这里四周的墙壁，墙壁再震动外面的空气，这个运动就这样发生种种不明的形态的变化；若不破坏整个世界的这个平衡，我们便不能引起任何一个运动，不能移动一粒砂子。

虽然运动、现象和事实的这些联系是普遍的无限的，然而没有一种力量是在强制之下活动。当台球戏的球同另一球撞着的时候，这后一个球就发生运动；但它只遵循它固有的由它的构造产生的规律，依赖于某些弹性规律进行运动；这个运动看来似乎是由于外力推动而发生的，其实是来自内部。这里同时有绝对的连续性和自发性。

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我们也找到自然同上帝、事实同观念、力量同权利的同样的调和。

在康德的著作中，如众所周知，哲学问题显然在于找出矛盾的论点的综合，这些论点很伤人们的脑筋；宇宙是无限的还是有限

的？時間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原因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一切都服從於普遍的和倔強的必然還是有行動自由的余地？

人的頭腦搖擺於這些正題與反題，否定與肯定之間。

康德傾其哲學思想的全力來解決這些矛盾，這些基本的二律背反。

最後，黑格爾把這個長期的思想工作概括為一個公式，說，真理在於矛盾之中；誰肯定某個命題而不拿它的反題和它對立，誰就會犯錯誤，誰就被狹隘的空幻的邏輯所玩弄。事實上，在自然中、在現實中對立物是互相滲透的，例如，有限同無限互相滲透：這個台地是有限的；它是一個不大的平面；但是在這平面的範圍內我能劃出無數的形狀；因此假如你僅僅肯定這個正方形是有限的，你只說出一部分真理，你就犯了錯誤；它同時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

假如你把理性的東西同真實的東西或把真實的東西同理性的東西分割開來，你也同樣犯了錯誤。

通常都認為事物一旦存在，那末它因此就脫離理想，它不可能是美、絕對真理等；有人認為理想只能是一種概念，它一實現，它就減退了。這是武斷的和錯誤的意見；一切合理的東西都必然構成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一種合理的觀念不反映到實際中去，也沒有一種實際不能歸結為一種觀念，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對立面的綜合、借助合理的和理想的同一性來調和矛盾這個偉大的公式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我們不要再說，這一個或那一個歷史時期只不過是半開化的時期；我們要說，一切東西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它存在，一切東西之所以曾經存在，正是因為它曾經存在，——這是有它的道理的，有自己的合理的根據的；但這不是完滿的理性。

我認為提醒馬克思的學說的信徒注意馬克思是黑格爾精神上的學生是多餘的；他本人在《資本論》序言中已經作了聲明（恩格斯

几年来似乎由于老年人喜欢回到他的起点的这种癖好，也致力于深入地研究黑格尔本人)。在确认现代社会的阶级对抗和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对这个对立面的公式作出了光辉的运用。这个对抗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在战争与分裂的制度下产生的，它准备新的制度，和平与和谐的制度。用马克思喜欢引用的赫拉克利特的老的公式来说：“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当彼此对立起来；今天的斗争只是明天的和解的开端。”

关于矛盾同一的现代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著名的观点里还可以看到：人类迄今可以说都是被历史的无意识的力量推动的；迄今人的活动都不是自动进行的；他们在活动，不过是由经济进化带动的；他们以为自己在创造历史，或者以为自己总是生活和停留在同一个地方；而事实上经济变化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不知不觉地影响他们的活动。人类像被河流冲走的船上熟睡了乘客；他无助于船的移动，至少他弄不清方向，他时时被惊醒，才察觉到环境变了。

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时，当阶级对抗停止时，当人类社会适应人们的公认的确实的需要占有巨大的生产工具时，那时候人类将走出许多世纪以来被事变的盲目力量推动的长期的混沌状态，并进入新时期；人将不受事物的支配，而支配事物的发展。但即将来临的这个充满意识和充满光明的纪元只是由于经过混沌的黑暗的漫长的岁月才成为可能。

假如人们在历史发展的黎明期就想任意支配事变和事物的过程，他们只会阻止这些事变的过程，他们就会浪费未来的资源。他们过早地想完全自觉行动，反而会永远失掉将来完全自觉行动的可能；这很像要求一个小孩过早地过完全自觉的懂事的生活，而不让他有机生活和最初表现出来的精神生活的自然的进化完成，要

他一生下来就成为思想家，这就会使他今后失掉思考的能力。

在馬克思看来，这个无意識的生活是未来的有意識的生活的条件和准备阶段，因此历史負責解决本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我要問一問，不违背馬克思学說的精神，能不能、該不該进一步发展調和矛盾、綜合对立面的这个方法和找出經濟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基本的調和？

請注意我以什么精神——恕我的前言这样冗长，因为不了解一般哲学問題就不能解决特殊問題，——請注意我以什么精神探求經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与道德的唯心主义的这种調和。

我不想給每一种观点确定它的地位，我的意思不是說有一部分历史受經濟的必然性的支配，而另一部分則受一种純粹的观点，受一种概念，受例如正义和权利的人道观念指导；我不是要把唯心主义观念和唯物主义观念截然分开。我认为这两种观念应当是彼此渗透的，正像在人的有机生活中腦的机械和自由的意識彼此渗透一样。

我已經說过，脑子里沒有一种运动不或明或暗地与意識的一定的状况相适应，而反过来，沒有一种意識的状况不与腦子的活动相适应。

假如可以剖开腦子并对其中发生的、形成的和联系起来的无限微小的运动进行观察的話，那末我們通过探究生理过程就能弄明白我們的思想、观念和意图的一切心理作用；但是那里存在着某种为生活本身所解决了的矛盾，我們对此似乎沒有料想到。

这么說来，就在我說話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它是被先行的与之有邏輯关系的思想所决定的，我們的一切思想都是按照可理解的邏輯关系——或者是类似、或者是对立、或者是因果关系——而連結起来的。

因此在我的思想的网里起作用的似乎只有邏輯的力量，而我現在的一切有意識的精神活动似乎决定于未来的观念。

我此刻能够把話說出来，这正是由于我現在所表达的思想在邏輯上已經为先行的思想、一系列先行的思想所决定；但这也是由于我想在将来实现我目前所看到的那个目标，实现某种意图；这是由于我想充分表明我此刻把我的思想引导到它們現在所遵循的方向，所以我的思想是由一系列先行的思想决定的，同时似乎是由未来的观念引起的。

相反地，在脑部运动的生理的机械的过程中，这时同我所表达的思想相适应的运动只决定于先行的运动；所以，公民們，我們的生活既是生理的又是有意識的生活，既是机械的又是自发的生活；在脑部連續运动中現在只决定于过去，而在观念、有意識的概念連續发展过程中現在似乎决定于未来。

因此或許可以說，在腦的生活发挥作用的方式同我們的观念和我們的思想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間存在着矛盾。

不过，虽然在这两种方式、在这两种观点之間看来有矛盾，綜合还是搞成了，調和还是搞成了；我的思想沒有一个不与脑部运动相适应，正如沒有一个脑部运动不至少与思想的萌芽相适应一样。

在历史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一切历史現象可以用純粹的經濟进化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經常的、不息的企求来解释。为了把問題弄明确，公民們，我认为問題就是这样提的，这就是我不得不要求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作的补充解释。

馬克思說过：“人的头脑本身不能創造权利的观念，因为它会成为虛幻的空洞的东西；人类的全部生活，包括道德的和精神的生活只是經濟現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

不錯！我同意这个說法。是的，人类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生活的发展只是經濟現象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但是同时須知

既然人的头脑存在，因而也就有形成人的头脑的先行的条件存在。

人类是长期的生理进化的结果，这个进化先于历史的进化，而当人类随着这个生理进化脱离接近低等的动物状态的时候，在新生的人类的最初的头脑中已有某种素质、倾向。

它们包含了些什么呢？

首先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素质，我称之为无私的感觉。随着沿动物生活的阶梯上升，就可以看到纯粹地自私的感觉越来越从属于审美的和无私的感觉。在动物界的低级阶段视觉不发达，听觉不完全；发达的是嗅觉、触觉和味觉，就是说首先为满足捕食的欲望的感觉，首先为满足生理的和利己的欲望的感觉才是发达的。然而沿着动物生活的梯子上升，就会碰到发达的听觉和视觉；正是由于视觉，动物可以看到自己要捕食的生物的形象，这是确实的，但是，它同时也看到许多其它不能引起它的动物的欲望的形象；假如动物由于有听觉而听到许多使它能探出它要捕食的生物的踪迹的声音或向它预告危险的声音，那末它也能听到许多同它的生理欲望和他的安全的实际条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和谐的声音。因此，由于超过动物直接的感受力的种种形象充满视觉，由于超过动物的直接需要的声音透过听觉；世界以生存竞争以外的其它形态渗入动物界。于是动物也有了对光的需要和享乐，被光所眩惑，有了对旋律和谐音的需要和享乐，被旋律和谐音所诱惑；审美的和无私的感觉就在有机的、纯粹利己的生活的基地上慢慢地发展起来，在充满喧声和光明的深林里，宇宙作为主宰统治动物界。

除了半人半动物在长期经济进化低级阶段所具有的那种最初的天性之外，在他身上还有着动物本身就已具有的那种能力，——从特殊掌握一般的能力，从个别掌握类的典型的能力，由个别的差异引出种属的类似特征的能力。

人，或半人半动物，在经济发展规律使其与之接触的其它人身

上不仅看到联合的或敌对的力量，而且看到类似的力量，于是在他身上就产生同情的第一个本能，由于类似之处已被掌握和已被确认，这个本能，就使他有可能推测和感觉别人的快乐，推测和体会别人的痛苦。还可以看到这种同情的感觉一开始就与动物的利己主义平行存在，它准备着所有的人在积年累代的斗争之后的兄弟般的和解。

簡而言之，人从他的生命一开始，甚至在他的思想第一次表露出来以前，就具有可以称为统一的感觉的东西，他的智力活动的第一次表现就是把万物，把一切形态和一切力量归结为隐约地察觉到的统一体；因此可以说人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人，因为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探索包罗万象的包含一切规律的整个统一体。

可以证明这第一种统一的感觉的是语言的自然的形成，语言有着各种只不过代表互相包涵的思想系统的词汇系统，有着各种表示精神范畴的词汇范畴。

总之，我同意马克思的这种说法：一切进一步的发展都只是经济现象在头脑里的反映，但我们作一点保留说明，即在这个头脑中已存在这样一些基本力量，它们由于美感、由于同情的思想和由于统一的需要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生活。

再请注意：我不是要把精神力量同经济力量对立起来，我不想重复我们的大名鼎鼎的朋友加布里埃·德维尔在几个月前如此卖力散播的这种历史因素组合论。不，我不是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但是我确信如果不是我刚才分析的意识的原始因素发挥作用，一定的经济现象便不能钻进人的头脑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同意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人所具有的东西和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东西相互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能把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分开；为了使一个从属于另一个，必须一开始就把它分开；但是这个分开是

不可能的：正如不能把人分为两部分和使他的机体生活和意識生活分开一样，同样也不能把历史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并使他們的思想生活和經濟生活分开。我的論点就是如此，我在希腊哲学中找到它的部分的证实。

希腊人开始确认經濟矛盾、确认建立城市秩序的法律、确认貧富的对立和調和，不是为了以后向世界散播他們对經濟問題的看法；不，他們是以同一观点把經濟現象和自然現象統一在同一个概念里。請回忆一下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阿納克薩曼德；他們在同一公式里指出种种因素，如自然因素冷和热，光明和黑暗；生理組織的因素健康和疾病；或精神生活的因素完美和不完美，平等和不平等都确实有着联系和矛盾，他們把这些取自自然或社会的对立面列成統一的表，在赫拉克利特那里，“Cosmos”（宇宙）一詞同时意味着由对立面調和的結果而产生的世界秩序和由派系調和的結果而产生的城市的秩序。希腊思想家就是用同一的观点掌握从社会混乱状态中安頓下来的世界秩序。

因为我用一些既太长又太短的話只能接触一下問題，我限于向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提出另外一个要求解釋的問題，我們對他們說：

你們对經濟运动以及人类运动的方向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假如你們有看法的話（这一点我不怀疑）？

光說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外一种是不够的；光說奴隶制代替吃人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劳动制代替农奴制，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是不够的。不，还需要回答這個問題：这是进步嗎？而假如是的，那末你用来測量人类发展不同形式的决定的和最高的思想标准又在哪里呢？再者，假如你想把这个进步的观念当作太形而上学的观念丢开，那末就請回答：为什么历史是这样发展——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經濟阶

段发展到另一个经济阶段，从吃人肉制度发展到奴隶制度，从奴隶制度发展到农奴制度，从农奴制度发展到雇佣劳动制度，从雇佣劳动制度发展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呢？为什么由于某种动力（我不是说由于天命，因为我仍保持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人类是按照现在的方向从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而不是朝着其它的方向发展呢？

假如承认人作为人来活动，承认我上面所分析的人类初期的这些力量的活动，在我看来，这个发展的原因就明白易懂。

正因为生产中的经济关系是人的关系，在还没有实现人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团结之前，没有一种生产方式不包含着基本矛盾。

斯宾诺莎就已以惊人的本领暴露了一切专制制度、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人对人的剥削所固有的矛盾；他证明这个不是从抽象的权利观点出发，而是根据于现实生活的矛盾。或者是专制政权把受它压迫的人逼得走投无路，使他們不再顾虑起义可能給他們带来什么后果，于是被压迫者便起来反对压迫者；或者是压迫者为了阻止起义，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他的臣民的需要和本能，从而使他們为自由作准备。这样一来，由于暴力的作用，专制政权必然要消失，因为这些暴力就是人。

在沒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之前，事情就是这样的。还是黑格尔非常确切地说过：“一切政治的或经济的苛政的本质的矛盾是在于它不得以对待惯性的工具的态度来对待人；而人，不論他們是誰，从来不想落到惯性的物质机器的地步。”請你們注意：这不只是邏輯的矛盾，这也是事实上的矛盾。

这是邏輯的矛盾，因为在这里人的观念，即具有感觉、自动性和思维等天赋的实体的观念本身，同机器的概念是对立的。这是事实的矛盾，因为人們像对待死的工具一样对待活的工具——人，这就是對他們想要利用的力量本身施加暴力，其結果就出現一种充

滿矛盾的和不穩固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这个矛盾既触犯人的观念，又触犯机械的規律本身，按照这个規律，人力是可以利用的；历史的运动是良心对侮辱人的制度的唯心主义的反抗，是人的力量对整个动荡不定的倚恃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自动的反应。吃人肉制度又怎样呢？这是双重的矛盾，因为它迫使人甚至在非战斗的場合杀害自己的同类，这就糟蹋了我所讲过的那种原始的同情本能，这是道德的矛盾；而把具有一定的从事經常劳动和生产的 capability 的人当作只适于供肉食的野兽来使用，这是經濟的矛盾。因为把人变成奴隶較少損害同情的本能和对主人更有利，从人的劳动可以榨取比人的肉体多得多的东西，这时奴隶制就必然要产生。

对奴隶制、对农奴制和对雇佣制不难作同样的說明。因为一切的历史运动是人同对人的利用之間的基本矛盾的結果，大家知道，这个运动所达到的极限就是导致一种經濟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将受到相应的利用。正是人类自己通过与自己的思想矛盾越来越少的經濟形式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有必然的进化，而且有明确的方向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因此，人在长年累代的延續中間只有追求一种同人的矛盾比現存的制度同人的矛盾少的社会制度才能追求到正义，这种制度是現存的这个制度准备好了的，因而也是經濟形式的进化准备好了的，但是同时，人类通过这一切制度的更替探索自己的道路，证实自己的見解，不管地点、時間和經濟要求如何不同，奴隶、农奴和无产者口中发出的叹息和希望的气息則是一样的；人类的这口不灭的气息正是所謂权利的真髓。因此不能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对立起来。它們在統一的不可分解的发展过程中混合在一起，因为我們不能把人同經濟关系分离开来，同样也不能把經濟关系同人分离开来；历史是一种按照机械的規律发展的現象，但同时又是一种按照理想的規律实现的願望。

归根結底，难道生活的一切进化不是像社会的进化一样嗎？

无疑地，生活是在环境和直接地先在的生物学的条件的双重影响之下从这一种方式过渡到另一种方式，从这一种状态发展到另一种状态，生活的全部发展可以用唯物主义来阐明，但是同时可以说聚集在第一批活微粒之中的最初的生命力和在地球上生存的一般条件预先决定一般的进程以及我们星球上的生活图景。因此，经历过进化过程的无数实体，在服从一定的规律的同时，从实现一定的生活计划出发进行合作。所以，生理的生活的发展也同社会生活的发展一样可以同时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我向你们提出的综合是同更普遍的综合联系着，我只能把它指出来，而不进一步加以论证。

让我们回到经济问题上来。马克思自己是否不把进步、权利的理想的概念、概念再引进自己的历史观当中去呢？他不仅宣告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的结果，而且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耗人类的阶级对抗将最后停止；他还指出到那时人将第一次实现完满的和自由的生活，劳动者将同时具有工人的敏慧的头脑和农民的沈静的毅力，在复苏的大地上人类将重新站起来，过着更加幸福更加高尚的生活。

难道这不是承认“正义”一词甚至在唯物史观中是有意义的吗？难道我向你们提出的调和不是已经为你们所接受了吗？

卡尔·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

I

历史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公民們！

在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图书閱讀小組”所組織的一系列的报告里，我們的同志台維尔准备讲《資本及其生产的現象》，而我将談談經濟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馬克思学派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是两种环境的产物：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和經濟的或人为的环境的产物，我說“人为的”环境，是因为它是人类創造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經濟环境里。它們在經濟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經濟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間——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

当我同你們一起研究两种經濟环境——封建的或者农奴制的环境和資本主义的环境或者雇佣劳动制度——的时候，我将使馬克思的伟大学說受到历史的檢驗。但是在开始研究这些环境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第一个讲话专门用来談談某些試图解释人类历史事件的唯心主义理論，而把第二个讲话专门用来談談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影响的一般看法。

1

人們不是用物质力量的作用来解释人的机体的現象和自然的現象，而是首先把它們归因于，——这是最簡單的解釋，——只存

在于他們的想像中的創造的干涉。这是在任务的困难面前的退让，而不是解决它；这甚至是創造新的困难。因此人类理性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一个接一个地破坏人在不同时期用来理解宇宙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破坏是为了重建，消灭那已經消化的东西是为了重新消化，——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是如此。

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出生、发育成长、性交、生病、死）被看作是想像中的神的意志。天主教所获得的很少，破坏的也很少，但是更換了許多名称，它改革了多神教的神和宗教的仪式（洗礼、圣餐礼、加冕礼、塗油礼）。起初，人們都认为有許多神分别管太阳的移动、风暴的掀起、閃电的放出，——后来的一神宗才把这許許多多的特性集中在一个神的身上。

但是人还必须弄明白社会現象，社会現象使他吃惊比自然現象还要厉害。他为此也求助于同样的方法。他說，神把人从尘世的乐园逐出而使他的命中注定要劳动和受苦。国家的盛衰也是由神的預見加以調节。

为了給你們举出例子来证明那些把社会現象归因于想像中的人物的意志的人們是怎样去解释历史事实的鏈条的，我不能找到比波須埃^①的《論世界通史》（世界历史的最著名的宗教总结之一）更好的选择了。从波須埃的观点来看，正如从一切唯灵論体系的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一样，不是生存的物质条件、不是由它們产生的需要、兴趣、情欲和本能推动人們和各个民族前进，——而是上帝催促他們，并且引导他們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道路走向他們所不知道的目标。

这个上帝，波須埃的儿子，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懲罰犹太民族，利用波斯人来恢复它，利用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来保护它。

① 波須埃(J. B. Bossuet, 1627—1704) 是法国羅馬天主教会的主教。——譯者注

利用杰出的安泰奧卡及其后继者来考驗它，利用羅馬人来支持它的自由……犹太人在耶穌基督之前就已生活在那些羅馬人的統治之下。而当他們不承认他和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羅馬人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神的报复和消灭了这个忘恩負义的民族。上帝决定就在这时候从所有民族中創造出一个新的民族，首先把陆地和海洋統一在那个帝国的統治之下。如此不同的各个民族——它們从前有个时候是彼此敌視的，而后又在羅馬的統治权之下結合在一起，——的商业关系，是上帝用来宣传福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維科^① 在自己的《新科学的要素》里非常正确地指出希腊人因为害怕假如他們采行一些对立的风俗习惯，就会引起神的反对，所以他們就干脆把自己的或多或少不洁淨的习惯分給神。波須埃同样地在自己的神面前充滿了救命的恐怖，因为神曾这么輕易地懲罰过列国。为了对神作出有利的安排，他就把他自己身上充滿的那种奴顏婢膝的感情加在神的身上。他向自己的高傲的学生說：“我不怕使你确信，在所有国王当中，**聖經的一切有名的預言最无可怀疑地关涉到的恰恰是你的祖先**”^②。因此，为了让教皇安坐在羅馬和頌揚路易十四，上帝就让大地布滿廢墟和用苦难来毀坏人类。人类历史的最著名的构想之一得出的結論就是这样。

我用一切唯心主义者所共有的这种波須埃的手法，可以向你們证明，上帝施行的用恐怖办法来更替国家，只是为了頌揚通奸和对面首表示好感。

上帝到底从所有大地上的儿子中間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做自己鍾爱的民族的父亲，来奠定一系列国王的始基（这系列后来受到大卫和所罗門的頌揚和由上帝的儿子耶穌基督最后完成）？他选出

① 維科(G. B. Vico, 1668—1744)是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譯者注

② 波須埃，《論世界通史》。

亚伯兰，一个最平常的面首。关于这件事圣经正是这样说的，而圣经的传播是神明的预见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当亚伯兰所在的那个国家遭遇饥饉时，他就去到埃及。但是在首途之前，他对自己的妻子撒莱说了以下的话（我逐字逐句引用，因为这处地方配得上萨耳学派的《人类的文件》）：

“13.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14.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

“15. 法老的大臣看见了，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16.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①

神圣的家长找到了如此合意的获取驴子和男女奴仆的方法，以致再次使用它。当他迁居到基拉耳并在加低斯和苏尔之间定居下来时，他“称他的妻子撒拉（即撒莱）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莱夺取了去。

“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即亚伯兰），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

“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②。

你们不要以为其它民族的历史不包括这样可靠的和无可辩驳的神的意志的证据。相反地，上帝恰恰希望民族之间的伟大冲突都是由婚姻的瓜葛而引起。由特洛伊战争开始而绵延到亚历山大夺取亚洲的希腊与亚洲之间的战争，就是由于美丽的海伦同牧人巴里斯的风流艳事而发生，当马其顿的战士从大流士^③的手中夺

① 《创世记》，XII,13—16。

② 《创世记》，XX,14, 15。

③ 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2—486年的古代波斯王。——译者注

去他的无数的妻子时才告終結。

上帝授与統治世界的权利的羅馬人只在他們把薩平^① 妇女从她們的丈夫手里夺去之后才成为上帝垂青的民族。当他們被胜利冲昏头脑而丢掉古代风俗时，上帝为了恢复自己的不守紀律的民族而提拔严厉的加图^② 并把他提高到监察官的称号，在他的身上复活了亚伯兰的美德，他取得一笔不大的錢就暂时把自己的妻子让与演說术教师霍登茲^③。

在中世紀以各种形式享受所謂“初夜权”的封建貴族是自己国家内的天生的第一流人物，而我們时代的有产者，不满足于用各种形式对自己作坊里的农奴妇女使用这种权利，强迫她們用妓女的血泪工資来弥补她們的低微的工业工資。他們是上帝的寵儿，上帝拿自己的恩惠的金雨洒在他們身上。而站在人行道上的庸俗的面首，只剝削一两个不幸者的劳动，上帝决定他們当警察和讓他們去懲罰社会主义者——否定上帝及其神的預見的存在的瀆神者。

墨守成規的和重要的人們可能认为这种让私通者和面首获得荣誉的世界历史多少有些荒誕不經和爱开玩笑。然而，假如它不像波須埃的世界通史那样奴顏婢膝，它无論如何是同样合乎邏輯的。当我用粗綫画出它的輪廓时，我是着重指出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荒謬，而不管他們是崇拜唯一的神或許多的永恒概念（其中包括正义、自由、博爱等等）。

2

神可耻地被逐出自然界。以前曾經归功于他的职能，現在被

① 薩平人，古代意大利的民族之一。——譯者注

② 加图（M. P. Cato，公元前234—149），公元前195年为羅馬执政官，后为监察官。主张保持旧习。——譯者注

③ 霍登茲（Q. Hortensius，公元前114—50）是羅馬法学家和演說家。——譯者注

认为是物质的属性。从十八世纪开始，人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把他从历史中赶出来。凡是百科全书派的无情的批评所到之处，以色列人的天真的神就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他像一个普通的乡村小警官似的被命令废除了。为了使人民顺服地承担加在他们肩上的重荷，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就着手工作并制造出一批新的神。天主教的神为资产阶级神话的半神——进步神，自由、正义、祖国、博爱等等的女神，所代替。他们把被废除了的神的品质赋予新的神，这些新的神是不死的，并有带领人们走向未来的天职。为了完成幻想，他们把这些神制成人的形象，使他们像耶稣和周比特一样赋有人的形态。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奥林普的神失掉了庄严和诗意，——他们比之多神教的和基督教的神话更不合理。他们的不合理的和矛盾的实质是引人注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俗的牧师——哲学家、道德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谬误、自己的虚伪和自己的欺骗行为起誓说进步神引导人类发展和完善，又说进步神的影响在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强而有力。然而在进步神统治的一切民族中间却可看到人类的最可怕的退化现象。而这个意见不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说的，而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化学家尤·李比希^①说的。在实行兵役制的一切欧洲国家里，成年人的平均身材都降低了，他们一般不能服兵役。在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步兵的最低身材达到一六五厘米，到1818年（3月10日法律）就降低到一五七厘米，而按1832年3月21日的法律则只有一五六厘米。大部分的应征者由于身材过矮或由于其它生理缺陷的结果一般都被认为不适于服兵役。在萨克森，服兵

^① 李比希(J. Liebig, 1803—1873)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译者注

役的身材在1780年要求达到一七八厘米；现在降低为一五五厘米，而在普鲁士则降为一五七厘米。从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普鲁士十年中平均每一千个应召者就有七一七人不适于服役，其中三一八人是由于身高不够，三九九人则由于各种生理的缺陷。1858年，在柏林不能征足预备军所需要的名额，——不足一五六人^①。李比希关于文明国家里人类退化的这种见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达尔文就写道：“贝图医生不久前证明，由于居住城市和某种职业而引起大不列颠的居民身材变矮；这个变矮是遗传的，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此外，贝图医生还指出，只有当人种达到最高的身材的时候，它才会达到自己精力和道德力量的最高阶段”^②。进步神引导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民族走向生理的退化和道德的败坏。

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个女神充满了如此之高的热爱，以致他们甚至把她们的极幸福的名字也刻在禁闭室和受罪的监狱里。他们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平等和博爱同在监狱里一样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受罪的监狱：全国的广大群众，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关进工场去并且命定承担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繁重的劳动，而得到的是可恨的工资。当天主教的上帝还占统治而共和主义者的三位一体的神还没有孕育和降生的时候，就是说在1789年前，那时工人们在星期日和节日（其数目有三十八天）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一年有九十天从自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就是说每四天有一天。但是自从资产阶级的女神代替了日历上的圣者之时起，企业主，不论他是自由思想者也罢，是天主教徒也罢，都取消了节日，强迫在星期日工作和拿更坏的东西给自己的工人吃，后者的降低的身量就是证明^③。

^① 尤·李比希，《化学应用于农业和生理学》，1862年。

^② 达尔文，《人的起源》，第一卷。

祖国女神有着妓女的反常的嗜好，——她只向那些打她、搶她和背叛她的人拥抱和施与自己的撫爱。甘必大之流^④，这些伟大的爱国的政客，把所謂光荣軍团奖章挂到俾斯麦的財政顧問布萊雷德的胸前去。这个亚伯兰的好儿子当討論賠款問題时向这个无情的胜利者說：“要是你心腸硬一点，要求法国拿出成百亿的錢，——她将会幸免于大禍”。这些爱国的金融家輸出法国的积蓄和用这些資金来装备在軍事和工业方面同法国竞争的国家。这些爱国的工业家从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訂购加工的原材料来破坏民族的生产。这些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和經濟学家协会的爱国者設法把中国的苦力輸入法国，为的是让自己法国的同胞命定挨餓和降低他們的工資。

正义女神允許和批准企业主搶劫工人階級，这种搶劫是在利潤、利息、地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

資产階級的思想体系也像以前的耶穌和貞女瑪利亚一样，曾經服务于和現在还在服务于欺騙人民的勾当，它已开始过时了，而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則給它以最后的打击。

但是經濟学家对我们說，政治經濟学的自然規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观察所发现并被日常經驗检查过的真正的規律。这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搖的規律。正如不久前的《时报》所写：“社会主义者，很像銼上的蛇，毫无成果地要想磨損銼上的所有銼齿”。所有的波利埃和庫賽尔—塞莱尔，当用給青蛙剥皮的活体解剖家的不动声色的鎮靜来观察民众的灾难时，他們就穿上了信仰这些自然

③ 德-梅勒和卡拉先生重新让基督教社会主义出籠。假如他們不想讓他們的教会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簡單的欺騙，他們就应当首先迫使自己的天主教徒朋友、一切謝加和其它伪君子(两关語：«Illaro»是姓，而«Karo»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在自己的工場里給工人恢复星期日和节日的休息。

④ 甘必大(L. Gambetta, 1838—1882)是法国資产階級政客，在第二帝国时代領導政府反对派共和党人。——譯者注

規律的法衣。受了这种宗教信仰的鼓励，庫賽尔—塞萊尔先生本月12日在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讲出：“假定事情的确如此，在現有的制度之下貧者应当变得更貧，而富者变得更富。但是从科学的观点，从絕对的、普遍的观点来看，这能证明什么？什么也沒有。”听一听經濟学家先生們說的吧：工人应当順从地忍受自己的灾难和餓死，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他們独力創造的財富。政治經濟学的自然規律就是这么下命令的。

讓我們来看看，这些自然的規律是不是果真像經濟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永恒的和不可动摇的。最永恒的和最不可动摇的經濟規律之一是竞争，这是一切进步、一切經濟发展的泉源。但是竞争本身打败自己，因为工业只有靠集中才能发展。現代生产的大企业——矿山、紡織厂、建筑企业、铁路、信貨机关等等，这都是由逐漸消灭成千的生产者的竞争而形成起来的巨大的垄断組織。某些工业部門，例如冲制货币或运送信件，已經废止私人竞争而由国家垄断。为什么萊魯亚—波利埃先生不要求让运送信件和冲制货币不碰到偶然事故和竞争的欺詐行为？簡單說来就因为資本家过份关心这些問題。經濟学家对他們的自然規律的不可动摇性的信仰是一种适应性的信仰：刚刚提到保护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就允許他們厚顏无耻地要求消灭一切竞争的国家干涉。

另一条規律，同样也是最不可动摇和最永恒的政治經濟学的許多規律之一，这就是供給和需求的規律。它規定商品的价格，而許多經濟学家甚至断言它創造商品的价值；总之，这是推动一切运动的規律。然而在历史上曾經有过繁荣的社会，其中并不存在这条規律。例如在中世紀，商品价格不是由供給与需要的規律，而是由行会的首領决定的；固然，在經濟学家看来，中世紀是处在健全的理性——普留多姆的健全的理性之外的时代。但是甚至在我們的資本主义社会里，难道供給与需要的規律的作用沒有由于侵占

的事实而暂时中止过嗎？大約在一年以前投机家成功地把法国的煤油抓在自己的手里，——正是他們，而不是供給与需要的規律对这种商品的价格起調节作用；罗特希尔德公司握有龐大的起作用的水銀工厂，它随心所欲地規定这种金属的价格。难道运送信件的价格是由供給与需要来調节嗎？假定由于革命的結果工人階級取得政权并使生产資料(机器、土地、銀行等等)国有化，供給与需要的規律就立即停止存在，因为产品将不是按照需求的购买方法，而是按照产品的需要和丰富情况进行分配^①。

断言政治經濟学的規律正像天文学的規律一样是永恒的和不可动搖的，等于断言經濟环境的进化正像星际世界的进化一样緩慢和不明显，等于支持断言我們的褲子和我們的背心的样式是永恒的和不变的那种非常可笑的意見。政治經濟学的規律和我們的服装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們随着生产和交換方式的改革而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理論，它也想解释历史事件。它得到人类学家和博学的自然科学家的支持，虽然它也是从愷撒那里起源的，我們說的是种族的理論。按照这种理論，賦有社会特征的特定的人命中注定要布滿整个大地和排挤所有其它的民族。可惜的是这个理論的发明者們关于这一人种的选择問題彼此之間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每一理論家都认为自己的种族应当当选。因此被宣布为最高人种的时而是斯拉夫人种，时而是日耳曼人种，时而是拉丁人种，时而是蒙古人种。但是力图取代已变得过份狹隘的祖国概念的种族理論，不过是翻新的古董，——就是那失去了自己

^① 在这里拉法格没有区别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是不可能废除的，从而价值規律也不会完全停止作用，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根本不相同的，而价值規律所起作用的范围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詳細論证可參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譯者注

的朴素的詩意的聖經教義。

这样一來，資產階級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从用上帝的干涉来解释历史开始，不知不觉地像你看到的那样，帶着自己的种族理論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上去。因为假如不在人类之外和人类之上安設一个上帝，那末另外还有誰能把那些保证种族优越的特点贈予最高的人种呢？

历史哲学在恶性循环里兜圈子，不能找到出路。

如果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能发现支配社会进化的規律，那末这是因为他們徘徊在唯心主义的幻想的烟雾瀰漫的黑暗中。他們輕視研究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他們忽視由这些条件所产生的欲望、需要和利益，他們认为人高于物质条件和认为人應該从自身或从超自然的上帝的身上去找寻自己的行动的原因。按照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者黑格尔的看法，观念在自己与自己对立中和头脚倒置中发展，在发展时就产生出自然的和社会的現象。

假如研究物质条件的經濟学家也表现出同样的虛弱无力，这是因为他們研究經濟界时使用了唯心主义者研究經濟界时使用的同样的方法。經濟現象和这些現象的規律在他們看来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他們害怕研究經濟現象对人群的影响和人群对这些現象的发展的反作用。他們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正如人不能对行星的运动发生影响一样，人也不能对經濟現象的发展发生任何影响。

經濟現象和經濟力量不是不变的。它們是在进化中，而且因为它们是人所創造的东西，它們的变革就比自然現象的变化来得快，而人只有当他理解它們向什么方向发展，它們的影响如何和后果如何的时候才不再成为它們的玩偶。这时候他就能控制它們和迫使它們为自己的需要服务。

人为自己征服自然。閃电的破坏性的电成为我們的奴仆，我們可以随心所欲地指使它，——它传达运动和思想，照明我們的夜

晚和將煮熟我們的湯。

機械的生產使人的生產力增加百倍而且它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的多產的母親，可是一直到現在之前對於生產者階級都只是災難。任何時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會里，工人階級的狀況都沒有這麼悲慘和不穩定，而波利埃先生們從官方的政治經濟學中一點也不知道並且否認這點。以前停留在家庭爐灶旁邊的男女和兒童的苦役勞動從來沒有這麼長久和這麼累人。然而工作的機器却在減少人的勞動，如英國人所說，它是節約勞動的機器。

經濟學家先生們向工人說：低頭，順服地承受自己的命運，因為正像耶穌所說，大地上總是有窮人的，——即使在大地上鋪滿財富的時候也是如此。

經濟學家於是就滾落到唯靈論者的愚弄人的幻想里去，——滾落到克制自己和卑躬屈節的幻想里去。

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使人脫出唯靈論者的宿命論的麻木狀態。它向工人高喊：起來罷，研究毀滅你的經濟力量，——它們是人類創造的，正如上帝是人腦創造的一樣，——你可以控制它們，假如你願意，——工作機器，這刑罰的可怕工具，便會變成上帝救世主，他使人從苦重的勞動解放出來，他給人以閑暇時間，好去享受肉體的和精神的快樂。

經濟唯物主義號召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起來暴動。它教導說，後者只有當它粉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形式時才能獲得解放。人類社會只有用炸毀對它已變得過份狹隘的經濟形式的方法才能發展。人的智慧只有在摧毀使他昏昏欲睡的宗教和哲學體系時才能進步，這些東西以前曾經是一種指南，而現在則變為反動和壓制的手段。

自從人類走出共產主義的形式，走出這個人類社會的第一只搖籃之時起，人類社會曾在生產方法各不相同的三個經濟環境中

成长，也就是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中成长。

这些经济环境的生产方法创造了人们的对立的利益并且把他们分为敌对的阶级。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构成它们的阶级的斗争的历史。因此，正如恩格斯非常明白地所讲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①。

在卷进全欧洲学者的关于“构造一致”的值得纪念的争论时期^②，圣提累尔对自己的著名的敌人居维叶（他把生物的创造归功于上帝）说：“你的自然科学只是事实的收集……假如不利用它们，假如不用它们来构成完整的建筑，这些材料能作出什么呢？”当在自然以外去寻找自然现象的原因时，的确不能有别的情形。只是当达尔文恢复了拉马克和圣提累尔的伟大学说，并且用大量的事实来使它成为不可驳倒的和英明的发现时，唯心主义才从自然史中被驱逐出来，于是自然科学，如圣提累尔所预见，就成为“普遍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5—226页。

② 指1830年间由法国生物学家圣提累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和居维叶（Georges Cuvier）引起的一场争论。圣提累尔认为各类动物构造图形彼此相似，故用“构造图形一致”的理论阐明动物进化的原理。居维叶本是认为生物一经“创造主”创造出来就不再有变化，所以反对圣提累尔的观点，攻击“构造图形一致”的理论。这一争论曾在当时各国生物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译者注

的和哲学的科学”。而它的哲学則推翻全部形而上学的体系。

馬克思把环境論引入人类的历史。但是請你不要以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唯物主义是近年来那些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所大力倡导的把自然科学的理論庸俗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作法之一。不是的，馬克思是这个学說的始祖。当环境論从1832年开始进入沉睡时，馬克思在1847年用法文发表的《哲学的貧困》里表述了自己的階級斗争的学說。在下一年，即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叙述了社会变革受制于經濟环境变革的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們的宿命論，創造了历史哲学并訓練无产階級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門的經濟革命。

II

自然环境：达尔文的理論

1

一切統治階級都靠肉体的和精神的强力压制的方法来維持自己的統治。

宗教是迫使被压迫的階級屈服于羈絆之下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是一个从属的階級，它进行斗争以反对得到僧侶支持的貴族階級，它当时是伏尔泰式的而且甚至向无神論献媚。但是一当它取得政权，它立即就倒戈相向并且急急忙忙重新回到自己祖先的宗教上来；現在它已不再害怕宗教的欺騙，而力图利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它用命令来恢复过去曾經也是用命令废除了的上帝，它重新修建被它推翻的祭坛并供养过去曾被自己赶走和迫害的牧师。牧师是最善于逢迎巴結的奴仆。因

此，工业企业的所有主陷入最低卑的伪善行为，而天主教的和新教的牧师則用最坏的毒物去毒化工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牧师为那供給他錢的人服务，他把貝朗日的俏皮的叠句詩歌选作自己的座右銘：

不要半途而废地跳舞，
要装腔作势，我的朋友，
为一切人跳舞！

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失去了自己先前影响的大部分。为了巩固它和幫助它完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事业，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想出了新的神：进步、劳动、自由、祖国等等；经济学家发明了自己的永恒的經濟規律，把同样起麻醉作用的經濟的宿命論和麻醉的宗教的宿命論結合起来。牧师兼经济学家的馬尔薩斯制定了自己的人口規律并宣称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沒有为所有的人儲备足够的食粮，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应当餓死，而另一部分人則因胃的消化不良而脹死。

但是资产阶级发现这个宗教的三位一体（基督教的宗教、自由的宗教和經濟的宗教）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精神奴役是不够的；它还试图根据科学理論来巩固自己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統治。

不学无术和粗暴的教会大发雷霆詛咒自然科学这些魔鬼的产物，把学者看作巫师和灾难的同謀者放在麻杆屑上烧死。资产阶级虽然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的，但是更狡猾，知道利用它們对自己是有益的；它迫使它們为自己服务。自然科学征服了自然的力量并使它們为资产阶级服务。不久之前发现的两种力量——水汽压和电，——应属于使它繁荣强大的因素之列。资产阶级已不再烧死学者，而是剝削他們。在大工业企业和大农业企业中，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同普通的无产阶级一样，为资产阶级的繁荣致富而工作。但是它还希望自然科学作另外的服务，它力图把自然科

学的最勇敢的理論变成精神压迫的手段。资产阶级想利用一切精神力量来把无产阶级永远釘在它的貧穷生活上。

查理·达尔文，我們时代的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把拉馬克和圣提累尔的学說从长期睡眠中喚醒，并在其中注入新的生命，給它带来胜利，——查理·达尔文试图证明社会的不平等是自然界的不能消除的事实。第二流的和末流的学者，他們靠天才人物的观念培养起来正像寄生虫靠獅子的皮培养起来一样，一步一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他們从自己的脑子里非常勉强地想出一个证据，认为达尔文的理論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最致命的反駁。他們說，在生存竞争中，胜利总是归于最有才能的人，最适合的人 (the fittest)。人世間的快乐依法应当是有产阶级中那些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閑者的命中注定之事。高踞国家樞要的应当是像梯也尔、馬克一馬洪、拿破侖三世这类的非常人物。社会的财富应当归属于各种各样的邦杜和交易所的奸商的继承的和获得的誠实；铁路、矿山、工厂的股息应当流入游手好閑的股东的腰包。但是貧困和体力、脑力的退化却应当是生产者的劳动、精力和脑力的报酬。

达尔文主义的赫克尔輩从博得资本家欢心的願望出发决心把科学降低到宗教的水平，他們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本来已經知道了的事情，这就是說，在奴顏婢膝方面学者并不比牧师落后，当上世紀的革命者砍断拉瓦錫——現代化学之父而同时又是危害革命的金融投机生意的同謀者——的头的时候，他們是做对了①。法国的、德国的和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想把科学理論变成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手段而沒有成功。科学無論在过去和将来总是革命的；它将根絕有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搖搖欲墜的統治而广泛地

① 拉瓦錫 (A. L. Lavoisier, 1743—1794) 是法国著名化学家。由于他加入“专卖公司”，剝削人民，并与外国干涉者有来往，被革命法庭处死。——譯者注

散播的偏見。人們力圖借以從科學上辯護社會不平等的達爾文學說，事實上卻以新的論據武裝着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去號召被壓迫的階級起來暴動反對野蠻的社會，因為在這個社會里那些播種財富的人反而只獲得貧窮，因為在這個社會里一切社會的財產都送給最不适合的人，他們忽視、歪曲和蹂躪有機進化的規律。

既然達爾文主義者擔負起弗萊培爾^①在宗教中、甘必大在自由主義政策中和馬爾薩斯在政治經濟學中的作用，並且既然他們宣稱自然界的規律也像上帝的規律一樣命定工人要遭受永久的社會的屈辱，那末我就不得不在我的關於社會經濟的演說中對自然科學家先生們施以批評，正如在第一部分演說中我批判地分析了唯心主義者的歷史觀點和經濟觀點一樣。但是我首先應當概述達爾文學說的優點和缺點。

2

用想像中的神的干涉來解釋植物和動物的起源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對於想望天國的極謙卑的人是十分容易懂的。事實上，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呢？神意有遠見地創造了植物給動物吃，而創造動物又是為了給人吃。可是有些事實卻同這種可愛的學說相反：動物常常因吃了植物的果實而中毒，而獅子把綿羊和牧羊人一併吃下去的事發生了，但是這是不值得重視的細微末節。當地質學從地層下發掘出來已死去的動物的骨骼和遺迹，從中可以看出現在存在着的動物種的粗略輪廓時，這就給一般公認的概念帶來了某些混亂。那些承認“每一現存的種都是神靈的具體化的思維”的學者例如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阿伽西^②宣布說，翼手龍以及其它

① 弗萊培爾(C. E. Freppel, 1827—1891)是法國天主教主教，從1881年起是議會中牧師派的首領。——譯者注

② 阿伽西(J. L. Agassiz, 1807—1873)是瑞士自然科學家，其觀點極端反動，是反對達爾文學說的人。——譯者注

的古生动物都是“先在形成的类型”。解剖学家阿文^①說，原型观念远在那些可以充当它的模范表现的动物种出现之前就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体现在我們的行星之上^②。阿伽西的先在原型和阿文的原型观念，在达到现代动物的完善状况之前体现在彼此交替的和不完美的形态里，实质上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十八世紀的粗糙的和朴素的观点的大吹大擂的旧調重弹而已。当时人們說，上帝預先塑造了动物的形态，而后在其中注入生命；古生动物是上帝丢弃的和沒有赋予生气的失败的蓝图。因此古生动物证明全能的造物者的技拙。

神学的創造論的荒誕不經，随着它应用的范围的扩大而变得愈益滑稽可笑。貝納登·德·圣彼埃尔^③认为自然界里到处有上帝的手指，他发现甜瓜和南瓜的肋骨本身就包含着神灵的某种思想：它們告訴家长如何在自己的儿女之間分甜瓜，而更多的南瓜的肋骨告訴他如何同邻人共享南瓜。这个善良的上帝是多么热爱人类呵！他教导說需要在家庭圈子里吃多汁的甜瓜，而同时又慷慨地把一片一片的南瓜分給朋友。

科学的胜利使創造論愈益成为困难的陣地。在中世紀，神学家議論亚当有沒有肚臍，正如我們的經濟学家議論經濟利益的和諧一样地詳尽和严肃。一部分人說，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肚臍对亚当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不是妇女生的。因此，他沒有肚臍。另一部分人反对說，上帝不会造出什么不完全的东西，但是亚当沒有肚臍就不完全；因此，他有肚臍。我們的好开玩

① 阿文 (Richard Owen, 1804—1892) 是英国比較解剖学家和动物学家。——譯者注

② Owen: Nature of limbs, 1849年。

③ 貝納登·德·圣彼埃尔 (J. H.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 是法国作家，卢騷的信徒。——譯者注

笑的拉柏雷^① 迫使自己的醉鬼爭論喝酒的概念先出現，還是想喝酒的願望先出現？神學家同我們的經濟學家一樣有很多的閑暇去進行無謂的口角，假如他們知道了解剖學上發現人體中有這麼多無用的器官，他們就不致那麼大驚小怪；關於這些器官的爭論會不得不無休無止地吵下去。

喬·聖提累爾在自己關於駝鳥翅膀的回憶錄中說：“這些鎖骨的萎退器官並沒有消失，因為自然界任何時候都不作迅速的飛躍，而常常留下器官的痕跡，甚至當它成為完全多余的時候，只要這個器官在同科的另外的種的身上曾起過重要作用的話。例如在食火雞的兩側的皮下可以找出翅膀的痕跡；在人的內眼角可以看到一塊粗皮，它被認為是許多四足類和鳥類都有的眨眼的薄膜的萎退器官”。有些器官在人身上由於它們無用而萎退，但在動物身上卻因練習而發展，這就令人信服地證明人是這些動物的後代，他不善於或不能把動物的遺產完整地保存下來。

不久以前的另一種新科學，胚胎學，揭露了更加驚奇的事實。唯靈論者賦予尾部的附屬物以巨大的意義；照他們的意見，尾巴是把人從其餘動物區別開來的器官，在他們看來人身上缺尾巴是人的優越性的外部標志。全靠尾巴來決定的可憐的優越性！有一次他們因為人的神的起源的如此寶貴的證據而感到難受的恐怖：某些旅行家說，他們在非洲的腹地遇到帶有這個雅致的和有用的附屬物的黑人。可是以後弄清楚這只是一種裝飾，上面提到的黑人把它帶在背後，像我們的美女帶着撐腰架一樣。而且唯靈論者也不必太高興，——胚胎學證明假如人沒有尾巴，那末只是由於失掉了尾巴——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母腹里。實際上，在人的胚胎上尾椎骨是自由地下垂的，像真的尾巴一樣。人體上除了某些部分

^① 拉柏雷(F. Rabelais, 1494—1553)是法國著名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巨人傳》。在他的作品中對黑暗的封建勢力和教會作了辛辣的諷刺和抨擊。——譯者注

之外沒有毛也被认为是人的特征的标志，但是現在知道人的胚胎体在六个月以前是长滿了毛的。現在沒有人否认人也像猿猴或狗一样是从卵子中生出来的，而且在自己的胎內生活与其它的动物种很相似，他也經過动物的发展阶段，只是形态更完整而已。

人的发展也像一切其它的动物一样，显然是那些在生物学的序列上先行于他的动物的发展阶段的简单的再現；或者把它归結为：低級的动物种只是高級物种的发展阶段^①，正像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只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天空的壮丽和自然界的美丽使上帝的光荣愈来愈暗淡；但是仍不缺乏证明他的万能的怪物。曾經是无神論者的夏多布利昂^②在自己的《基督教的真諦》里勇敢地写道：“怪胎正是无神論者所讲的引起宇宙产生所必要的那些事件的規律的例子。上帝容許它們是为了向我們指出，要是沒有他創造将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圣提累尔从上帝身上夺去他的万能的这个证据，他指出說怪胎不是越出自然規律范围之外的什么东西，在怪胎的机体里我們看到的只是变形的不完全，由于变形的結果，它本来应当过渡到自己的正常的类形，怪胎只是停止发展的类型。

当胚胎学揭露了动物的进化过程的时候，对发达的机体的研究表明，这一个或那一个器官不論采取什么形态，它总是由同样的一些因素組成的，虽然有时这些因素变形变得来不能辨认。例如螯虾的上层的甲壳是它的骨骼，它的骨骼是长在外面，而不是长在身体內部。母袋鼠的袋是皮的一层很深的皺折，象的长鼻子是鼻孔的过度延长的結果，犀牛的角是长在一起的毛发积聚起来的。亚

① 塞莱士在自己的《腦的比較解剖学》里說“魚就自己的許多器官来看是高等动物的永恒的胚胎”。

② 夏多布利昂(F. R.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是法国作家，在十八世紀末資產階級革命时期，曾积极参与勤王論者行列。他的《基督教的真諦》是一部反对十八世紀无神論和唯物主义的著作。——譯者注

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羽毛是为鳥而生，同时鱗片是为魚而长，因而可以拿羽毛同鱗片相比，同样也可以拿动物的骨头和魚的骨头相比，拿指甲和角，手和河虾的螯相比。因此构成个体的各部分既是相同的，又是有差别的”^①。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都推翻了創造論并产生出新的观念，奥肯^②把它概括为：“人不是創造出来的，而是发展过程的结果”。

3

上帝的假設既然被推翻，为了解释生命的現象就必须訴諸于物质力量的作用，必須把植物和动物的产生及其变化归因于像圣提累尔所說的**环繞世界的宇宙环境**的作用。从上帝这个造物主的观念出发可以断然解释一切，而无需过份絞尽脑汁：人被創造出来是为了用自己的血去喂跳蚤和臭虫，工人被創造出来是为了給寄生虫提供地上的财富，房客被創造出来是为了带来房租，而房东被創造出来是为了把房租放进口袋，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废除这些方便的和悬切的解释。可是，在奴顏婢膝方面不亚于僧侶的現代自然科学家，却失掉了那种使信徒如此漠不关心地沿着糊塗的道路行进的极美妙的愚昧无知；他們不得不仔細寻找有机体进化的基本的自然的因素，但又并不希望完全理解一切現象。查理·达尔文的伟大功績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因素并指出它們在物种形成中的作用。

达尔文有幸生在畜牧业的典型的国家。他发觉家畜經過多次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由养畜家人工地加以巩固。赫胥黎举了以下的典型例子。馬薩諸塞州的綿羊很会跳；沒有一个籬笆它們跳不过去。农場主毫无办法，不知道如何才能圈住它

① 亚里士多德：《动物史》。

② 奥肯(L. Oken, 1779—1851)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譯者注

們。羊群的主人自言自語說：現在我知道如何同我的綿羊的愛跳的性情作鬥爭。他細心地撫育短腿的綿羊，並利用它們作為配種的公羊。經過幾年，所有他的羊群都變成短腿的綿羊，失去了自己的祖先的跳躍的能力。他的鄰人效法他的先例，於是現在在美洲有短尾巴的綿羊的品種，正像我們這裡有短尾巴的狗的品種一樣。

這樣的現象在野獸中也能看到。母狼和母家兔的幼獸雖然很相似，但是完全不一樣，它們彼此之間有相當顯著的區別。最貪食的，就是吃媽媽的奶比別的吃得久的，成長得較快並且較快學會躲避危險和為自己找獲食物。它有更大的可能性達到成熟的年齡和生產後代，並且也有更大的可能遺傳自己的貪食，保證後代也有自己的優越性。野生的公火雞很會走路，母火雞帶著它們走很遠的路。沒有力量作這種旅行的小雞雛便會落后和死掉，而年輕力壯的公火雞有堅強的肌肉，忍受得了緊張，並把自己的優點傳給後代。在自然界里既沒有道德，也沒有善心，也沒有理智，——它的盲目的力量無情地消滅弱者而把生命只留給強者。

使動物比它的敵手優越的這一個或另一個器官的最不顯微的變化保留了下來，並且一代傳給一代，愈來愈加強。作為進攻武器的獅子的利爪和像盾牌一樣保護它的胸部的多毛的鬃，其起源都可以這樣來說明。動物獲得它們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對象的顏色：變色蜥蜴是綠色的，像樹葉一樣，虱子是灰白色的，像頭髮下面的皮膚一樣。顏色的這種相似保護它們躲避敵人。假如雌鳥也像雄鳥一樣有著這樣華麗的羽毛，那末當它們不得不停留不動孵小鳥的時候就很容易成為鳥類強盜的俘獲物，如此等等。

因此，我們看到在野生動物中存在着**自然選擇**：在生存競爭中最有用的、最能適應於自己的自然環境的獲得勝利。自然選擇和人工的，即由人所引起的選擇的不同之點是在於：人選出和發展動物的這一個或另一個特性時，他注意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且甚

至常常牺牲动物本身；例如由家养小猪喂肥而生出的油脂对它們是有害的。而自然选择只保留对动物有益的特性。自然的力量是非理性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們的作用的结果却是合理的。

可是在自然界也有合理的力量在起作用；凡是哪里有选择的位置，那里就应当作出决定，必然会有意識的活动。在草地上和花坛上飞来飞去的蝴蝶在落下之前先要选择花朵，我們的幸运是它們也像我們一样爱顏色，因为正是它們保留了和改善了花的鮮明的色彩。事实上，当它們从这花飞到那花时就分送結实的花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最鮮明的花朵最受它們光顾。在鳥类中間美的感觉也是非常发达的。雄鳥服侍雌鳥，在它面前昂首闊步并且喜欢穿上漂亮的羽毛。猿猴，这些动物界中人类最接近的祖先，把自己的用采色花圈裝飾起来的臀部在自己所鍾情的雌猴面前炫耀。庫松先生，这就是美——这个上帝的高尚的特性——的所在！

假如植物和动物不具有比一切宗教的秘密更神秘的某一种性能——遗传的性能，它們就不能发展，正是这种遗传性能使它們得以把它們所获得的特质传给后代。一切有机体都是自己祖先的特质的蓄電池，——它从它們那里取得、保留和继承甚至它們已經不使用了的这样一些器官。

自然的和性的选择，达尔文的这个英明的发现，不能提供解释一切生命現象的钥匙。其中有許多就不服从靠它作出的解释，而达尔文就是第一个准备承认这一点的。我只举一个例子：鸚鵡的非常軟的发音器官無論如何不能就其自然状态加以利用；它的惊人的能力只是当鳥进入人类社会之时才显露出来。

为了理解甚至是某些有机生命現象的最一般的特点，也必須研究器官平衡的規律，圣提累尔称之为**器官从屬**的規律，而居維叶則概括为：“每一有机体都形成統一的、完整的和与外界隔絕的体系，它的各部是彼此适应的而以自己的协同动作产生一个共同

的动作。如果不是同时改变其余的部分，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改变”^①。例如在引起牙齿运动的颞和肌肉上，在牙齿依托的颞骨上，在颞和鼻的骨头和肌肉上，在动物吃东西的方法上，因而在它的肠子的长度和形式上，总而言之，在它的身体的所有部分若不引起或大或少深刻的变化，动物的牙齿的形式便不能变化。这些器官的形成像鸚鵡的声韧带一样很可能是它的爪、翅膀和其它的器官变形的结果，这些器官之所以必须改变，是为了适应外界的条件。

假如所有的有机体形成一个体系，其中各部分是如此紧密地彼此联结在一起，若不触动所有其余的部分，则任何一部分也不能改变，那末宇宙环境同它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也形成一个庞大的、无穷的体系，而且其中的各部分也并非不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若不影响在宇宙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和植物，宇宙环境就不能改变，反之，若不影响自己的宇宙环境，动物和植物便不能改变。例如森林对地区的温度，对它所得到的水分的数量和对它的植物土壤的形成发生一定的影响。达尔文转而注意由最微小的生物和最平凡的原因所引起的后果。吃土的蛆制造黑土并使它暴露在外面，同时把掩盖它的小石头埋藏在自己的线状的粪便之下。乡下老姑娘对母猫的爱间接地对空气的湿度发生影响，因为母猫要吃掉田野的老鼠，使老鼠不能破坏蜜蜂和胡蜂的蜂房，让胡蜂和蜜蜂去分散花粉因而促成植物的结果和繁殖。因此，假如周围环境决定自己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那末，反过来，植物和动物又再造出赋予它们生命的宇宙环境。正是在有生物对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的这些事实面前，经济学家可以大大方方地断言说，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完全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的规律。

处于同一环境中的植物和动物，由于相邻的关系彼此发生影响，正如同一体体的各部分彼此相互影响一样。康德已经注意到

^① 居维叶：《论地球上的革命》。

森林里的树木不像种植在开闊的田野里的因而不能擋风的树木那样生得矮小和弯曲。森林里的树木彼此互相保护，整齐有序地向上生长去寻找空气和阳光。植物学家勒格利发现成群生长的植物比其余的更容易改变。他說：“某些阿尔卑斯的植物彼此变形，而且呈現为，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特殊的**社会类型**，它們在不同的丛中，从而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这无可爭論地证明它們的形态改变是从它們的結合之时开始的”。

有机体彼此之間的交互影响在动物中比在植物中更强；它改变它們的器官并从它們身上引起反自然的和直到現在尚不为人所知的心理上的特性。人所共知，动物中的母爱是如此强烈。假如雄的丢掉自己的幼仔，像有产者丢掉自己的不合法的私生子一样，假如它們有时甚至吞掉它們（强奸自己的工厂女奴的工厂主以剝削她們感到滿足），那末雌的相反地却保护自己的幼仔，关心它們，而昆虫的雌性甚至拿自己的身体去喂它們。但是蜜蜂的雌性，作为蜂房之母，却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为的是不要引起蜂房中的紊乱。它們牺牲自己的母性的感情是为了集体的安宁。在相同的感情的影响之下处女母亲也杀死儿女，她們不想扰乱人心和引起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道德上的憤懣。

社会的联系压低甚至扼杀为了保护生命比母性爱更需要的其他的感情，——这就是个人的利己主义，它在动物中間，像在最文明的有产者心中一样，得到如此瘋狂的发展。在猿猴、象、水牛中間，——在一切群居的动物中間，最强的雄性常常奔赴有危险出現的地点，并且牺牲自己去保护幼仔、雌性和集体中一般地較弱的成員。

你們可以看到，在自然界中对生命的創造和发展起过作用和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很多、很不相同的。我不想在这里把它們完全都列举出来，正如自然科学家不想把所有这些力量都发现出来

一样。但是当这些先生們丢掉自己的科学方法而退化为社会学家（这名称是他們自己想出来的，对他們倒很适合，——因而它也是够笨的）时，他們忽視在自然界里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只保留着一个竞争，生存竞争。他們阉割自己的科学，为的是使它成为辯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

自然科学家所宣传的生存竞争只是經濟界所发生的事情在他們头脑里的反映：它只是把經濟学家所神秘化了的工业的和商业的竞争移到植物界和动物界。最低限度，达尔文是意識到这点的：在他的《物种起源》里他公开承认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只是在讀过經濟学家馬尔薩斯的著作之后才在他的脑子里产生出来。当把自己的生存竞争搬到社会科学中去时，达尔文主义者，自以为是这样的机灵鬼，只是把他們所借用来的东西交还回去，并用自己的方式复述經濟学家的学說；他們沒有料想到他們的建立在生活竞争事实上的物种起源的新理論是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的輝煌的证实，因为正是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义教导說，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植根于經濟的底土里。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达尔文主义恰恰产生在英国，在这个国家里，經濟竞争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度的发展，它在这个竞争占統治的国家里获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成为統治階級的一种工具，他們借助这种工具来为社会的平等辯护和假自然的名义使工人注定遭受貧困和退化。

4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这种声名狼藉的生存竞争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或从社会的观点看来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們已經看到，靠它的帮助不能解释許許多多的現象（鸚鵡的声音器官，反母性的和反利己主义的感情等等）。但是，使最适者能繼續生活的生存竞争或許常常是机体的进步的原因罢？胜利归

属于最能适应周围环境的动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最能适应的动物是否常常又同时是最有才能的、最发达的呢？是否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就是说恰恰是那种不能适应于恶劣的生活条件的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生物总是被战胜和死掉呢？达尔文指出这种情况。雷·朗开斯特^①最后地阐明了它的意义。他写道：“自然选择常常在减少它们的身量方面影响这一种或另一种动物，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某些动物的小身量有助于它们的延续生命，因此它们中有许多就缩小到显微镜下的尺寸。但是这种缩小达到极限时就会引起某些最重要的器官的消失。很小的动物的需要同大动物的需要比起来是有限的。心脏和血管、鳃和肾脏、甚至腿和肌肉常常被较大品种的缩小了的和退化了的后代丧失掉”^②。雷·朗开斯特举出蜥蜴和多苔藓虫硬体等等作为这种退化的例证。由此可见，甚至在动物界里生存竞争并不总是导致进步，有时反而是衰颓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它在人类社会里的作用又是怎样的。

野生动物在个体上从它所获得的特性得到好处。关于文明化了的人能不能这样说呢？南非洲的牡绵羊获得在自己的尾部积蓄油脂的能力，霍屯督族的女人^③在自己的乳头积蓄油脂，——两者都是在饥饿时靠这油脂作养料。农人生产的粮食比他一年中所能吃掉的多，但是既然他不能把粮食的多余部分储存在自己的皮肤之下，因此他就不能在饥饿时享用它。既然蜜蜂要交出自己的蜜，农人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粮食交给偷窃他的地主和其余的强盗。

利齿和铁爪对于狮子来说是劳动的工具，就是为自己获得食料的手段。狡猾是狐狸劳动的工具。但是既然这些工具成为它们身体的组成部分，那末就不会被其他动物用来转而反对它们自己。

① 雷·朗开斯特(E. R. Lankester, 1847—1929)英国形态学家。——译者注

② 雷·朗开斯特：《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

③ 霍屯督(Hottentot)是西南非洲的民族之一。——译者注

相反地，人类制造的武器就不是他們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他們的腦子的思想可以同腦子分开而物质化在书里，在机械发明里，在化学发现里等等。人的武器和思想可以为资本家据为己有，后者把它们用来反对它们本身的創造者。发明危害着发明家，但是使工业家和资本家发财致富，他們除了发明偷窃发明家的艺术之外什么也沒有发明。铁路給那些日夜辛劳的修路工人很微薄的工資，但帶給股东优厚的紅利，股东的全部劳动可以归結为收利息。

因此，达尔文主义者先生們所宣传的生存竞争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同动物和植物比起来是生活在另一种条件下。

达尔文成功地把一种經濟理論，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搬进自己的科学。但是当达尔文主义者回过来把自己的关于最适者生存的学說硬拉进社会科学时，却遭到惨敗。他們对社会的了解，正像樵夫对植物学的了解一样。人是动物，对此我无异議。建立在經濟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兽性的社会，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还不足以证明生存竞争在人类中間起的作用同在公火鸡和牡犏中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人类社会里，自从他們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之时起，生存竞争就体现为双重的形式：个别的人之間斗争的个人形式和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績之一就在于：他們从1847年起就从事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这两种形式的詳細的分析。

III

人为的环境：阶级斗争的理論

1

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

經濟的或他們自己所創造的人為的環境里。這兩種環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對抗作用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進化。

當人成為一種有機生物，某些自己的性能和習慣同其它動物剛剛分開來的時候，可以把他看作是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直接產物。

史前期的人類，石器時代的人類，如我們在比較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現存的野蠻部落而得知的情形一樣，他們只是感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其實，他們完完全全生活在自然里，他們赤身露體來來去去，在寒冷的地區他們有時也在脖子上系塊獸皮，或者在前面或者在后面，視風向而定。他們不會使用五金，幾乎不知道用火；他們用樹枝為自己構築住宅，像黑猩猩一樣；在他們身邊，像在猿猴身邊一樣，除了石頭和木棍之外沒有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他們還沒有學會制作瓦罐來做飯。他們的語言是如此發育不完全，以致其中沒有動詞“是”，也沒有像“樹”、“花”、“熱”等這樣一些類概念的標志。他們的智力的發展是處於如此低的階段，以致他們不會計算三或四以上的數字。在解釋這些原始人種的形成上，自然科學家可以只限于對自然力量的作用的考察，像他們在解釋其它動物的形成時所做那樣。生活的競爭，生存競爭，像我們在動物中所看到的，也是原始人類的生活規律。為了捕獲野獸，為了奪回和帶走雌的，他們施展自己的手和腳的彈力和力量，他們用牙齒和指甲撕裂自己的敵人；最強的、最機靈的和最能干的成為勝利者。

但是這種**動物**的生存競爭還在史前期就改變了樣式和獲得新的特點。從人們學會冶煉金屬之時起，從進入青銅時代起，人們在自己的戰鬥中不再只是使用自然的武器；這時他們有了人造的武器，因而勝利常常不屬於較強者，而屬於有最好的武裝者。因此，許多人類學者認為，生活在歐洲的石器時代的人們會被來自東方和知道使用青銅的其它人種所消滅和排擠掉，是確實無疑的。為

了证实这个观点，他們指出不論在哪里——在爱尔兰、在苏格兰、在挪威、在德国等等——遇到的青銅的劍，不仅相似，而且基本上完全一样；可以設想它們是同一个工匠鑄造的。它們的唯一的差別是在上面雕刻的裝飾；在丹麦所发现的青銅劍裝飾的是螺旋紋，在南方发现的是直綫紋和圓圈紋。所有这些劍都装了不大的柄，由此可以想見，持有这些劍并且战胜了石器时代的人們的那些人，手是很小的。

在史前期发生过的事情在我們的时代还在重复。当某个斯坦利、布拉察^①或任何其他一个文明的强盜去与刚果黑人作斗争时，胜利的不是两个敌人中較强、較机灵和較勇敢的一个，而是左輪手枪和火药。在工业的戰場上情况也是一样的。当手搖織工和大企业的織工为市場而进行爭夺战时，胜利不是属于精力較旺盛的、較爱劳动的和手較巧的工人，而是属于机械車床和蒸汽的动力。因此，在人类的社会里发生的情形和在动物中不一样：为人們保证胜利与其靠他們的自然性能，不如靠他們的劳动工具和他們的武器。可以說，为生存和进步的真正斗争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他們的人造的器官之間进行。带着植物和动物之間竞争的特点的这种工具和武装的竞争因而就成为工业技术和軍事技术这样惊人发展的原因。

当两个用同样高度技术設備装置起来的工厂彼此为市場进行斗争时，它們利用自己的工人来搏斗。它們爭先恐后地降低工資和延长工作日；它們用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用簡單的粗工来代替熟练的工人。主人們为生存的这个斗争既沒有提高两个竞争者的肉体的质量，也沒有提高他們的精神质量，而只是引起工人階級的肉体的衰頹和精神的与道德的墮落。

^① 斯坦利(H. M. Stanley, 1841—1904)英国人；布拉察(P. P. Brazza, 1852—1905)法国人。两人都是以“探險”为名到非洲去的殖民主义者。——譯者注

出自动物界的在人們中間的生存竞争因此带有另外的特点和引起植物和动物中的斗争所沒有的另外的后果；因此誰想弄清人类的进化，就应当分析人們所經過的人为环境及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人們生活于其中的双重环境，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不是不动的，不是常常平衡的，它是經常变动的。

地球形成的历史告訴我們，自然环境是在进化中。依据这个宇宙进化的事实，圣提累尔展开了自己的物种形成的理論；例如，对爬行綱之轉化为鳥类，他是用大气的化学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大气中充滿氧气使温血动物的生存有可能。但是宇宙环境的进化是緩慢的，要出現一种重大的改变就需要几千年，因此动物种和植物种在我們看来似乎是沒有变动的，因为給予它們生命的条件变化是不显著的。反之，人为的环境进化却很快，因此人的历史同动物的历史比起来則表现为这样剧烈的和多样的运动。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間的巨大的差异，可以用人們在其中实现着进化的那人为环境的差别来解释。巴黎人在自己的智力发展上同火地島土人的差别之大远远超过各种狗和猿猴彼此之間的差别。

2

人不是为自己創造特殊的人为环境的唯一的动物。某些动物种(海狸、蜜蜂、螞蟻等)也为自己創造人为的环境，这使它們有可能达到为其它种所不知道的那样的发展程度。

伟大的古代的医生泽尔斯^①在一千八百年前写道：“假如人們以为自己同动物的区别是在于他們会建筑城市，頒布法律和設立政府，那末他們就大錯特錯了。螞蟻和蜜蜂也会做这些事情；在它

① 泽尔斯是一世紀时古羅馬的学者，写过关于医学的著作。——譯者注

們中間也有自己的王，它們保護它和為它服務，也有自己的戰爭，自己的勝利，自己對戰敗者的懲治，它們也有城市和郊區，嚴格規定了的勞動時間。它們殺死和追捕昆蟲……假如某人能夠從天上看地上，他會看出人的事情與蜜蜂和螞蟻的事情之間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在澤爾斯之後曾有過許多耐心的研究者，研究這些小動物的習慣。

螞蟻窩是自然的真正奇蹟之一。富萊爾^①說：“它們的顯著特點是在於缺乏不變的形態——即每種的特殊形態——，像我們在胡蜂房和蜜蜂房中所看到的情形那樣。螞蟻懂得使自己的建築適應於環境和因地制宜使用地形條件”。它們築牆和豎柱，架梁和鋪板，一層之上又蓋一層，曾經發現有的螞蟻窩數達四十層。在塞內加爾如此眾多的白蟻巢穴高出地面達三米到六米，而且建築得這麼牢固，可以承受一個成年人甚至一條水牛的重量。它們通過三十厘米寬的地下溝與外界發生聯繫。人們的建築同這些小昆蟲所修建的東西比起來又算得什麼呢？假如我們拿這些建築的高度和寬度同它們的建築者的身量比一比，人的手所做出來的東西在我們看來是滑稽可笑的。金字塔如果按照這樣的規模修建起來，應當有一千米高。然而人類建築中最高的古蹟希奧普士^②的金字塔只有一百四十六米高，斯特拉斯堡教堂只有一百四十二米高，聖讓克塔只有五十八米高。

在螞蟻窩里有糧倉，其中儲存着由群體收集來的谷物。螞蟻去掉谷物的皮並把它丟出去。還沒有發現它們如何防止谷物發芽的秘密方法；當谷物發芽的時候，它們懂得及時加以制止。在陰涼的地窖里它們保藏着剝碎的樹葉，供給它們非常喜愛的小小的蘑菇。有的人甚至斷言說在得克薩斯有一種特別的螞蟻農人，善於耕地

① 富萊爾(A. H. Forel, 1848—1931)瑞士昆蟲學家。——譯者注

② 公元三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譯者注

和种地；但是这个事实还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

誰会想到螞蟻也从事畜牧业？——尤貝揚声說。真有这样的
事，螞蟻从事畜牧业。它們繁殖供給它們甜的分泌物的蚜虫群，它們的
这些母牛越多，蟻窩里的福利状况就越高。它們在树干上构筑小仓库来
存放草虱子；它們在地下和在根下构筑另外的小仓库。搬家的时候它們
就帶着一起走。秋天它們收集它們的卵子并且細心留意着幼虫的出現。
阿杜邦看見过一种螞蟻会利用芽虫来作耕畜；它們强迫芽虫在排成两排
的監視人之間拖运刹碎的树叶，而在完成这件工作之后又把它們关进蟻
窩里去。

在原始的人类社会里只作了胆小的最初几步的劳动分工，在螞蟻中
已发展到非常之高，并且在同一蟻窩的居民中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以
致人們可以把它們认作不同的种的代表。再生产的职能由几个雄的和一
个雌的来担負。人們想在动物中找出自己特有的社会組織，就称这个雌
的为女王，然而事实上她根本没有什么君权的属性。无性的螞蟻关心
着她，喂养她，但是同时又机警地監視着她并且常常逮捕她，这些无
性的螞蟻是螞蟻中的主要群众并分为战士和工作者。

在蟻窩中統治着的是最高級的共产主义。这里面的劳动是自由的。
螞蟻帶着一种永不衰歇的热情进行劳动。所罗門拿它們作榜样来教育
自己属下的犹太人。“懒人应当去請教螞蟻，看看它們的行动就会变得
聪明些。在它們中間既沒有首长，也沒有監督者，也沒有統治者，但是
它們在夏季就准备自己的粮食，在收割时就收集自己的口粮”^①。在
蟻窩中一切都属于大家。在螞蟻中共产主义的感情发展到这样的高度，
甚至已經采获到手的口粮在某时期內都归整个社会支配。螞蟻的消化
管道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

① 所罗門的寓言，VI, 6, 7 和 8。

前面部分，好像是整个蚁群的小仓库，——拉长的食道形成像嗉囊样的东西，其中存放大量的液体食物。在需要时蚂蚁就把这液体吐出来供给年轻的伙伴、幼虫以及不懂得为自己获得饲料的雄蚁吃。在某些澳大利亚种身上这个特性被利用来把一定数量的蚂蚁变成真正的储藏的盆：把它们填满液体食物，使它们必须保存好，而在需要时又要它们吐出来。

秩序和和谐不仅统治着蚁窝的内部。有时也同其它的蚁窝建立和平的对外关系，虽然一般说来它们之间经常进行剧烈的战争。富莱尔在日内瓦郊区的一块平原上曾看到一个蚂蚁部落，由一百多个群组成，过着完全和平的生活。在北美洲的某一地点库克曾发现一千六百到一千七百个圆锥形的蚁窝，高达二到五英尺。所有它们的居民都处在最亲密的关系中，任何时候彼此都不攻击，而团结起来防御外敌（蜘蛛，蛇等等），并在建筑和修理住宅时彼此互相帮助。这是蚁窝的联盟。

以上所举的事实（我还能举出许多其它的例证）证明智力发展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以致达尔文完全有权说：“蚂蚁的脑子是有机物质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之一，甚至比人脑更令人惊奇”。

智力发展的这种不平常的高度水平，自然不能用达尔文主义者先生们的生存竞争来解释，而应当用蚂蚁所创造的人为环境的保卫的和教养的影响来说明，这环境消灭蚂蚁内部的一切斗争、一切个人的竞争和只留下整个群体同周围世界的集体斗争。

3

最新的历史研究证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成于其中的第一种经济形式。即使现在在亚洲、在大洋洲、在非洲甚至在欧洲还有一些民族除了对自己的小房屋及其附属的小园地的所有之外，不知私人的土地所有为何物。一切其余的土地都归整个公社集体所

有；可耕的地段在各个家庭之間，視地方习惯而不同，有的一年重分一次，有的三年或七年重分一次；森林和牧场是不可分的财产。财产的这种集体形式所引起的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組織，我們在建立在第一种所有权之上的任何别的社会里是碰不到的。在实行集体所有的民族当中，尽管有种族和气候条件的差别，我們却可以找出同样的恶德、貪欲、美德以及相似的习惯和思想方法：人为的环境消灭着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多样性。例如盜窃，这是生活在私有财产条件下的文明的有产者的最主要的美德，而在原始公社中間是人們所不知道的。这些公社的一切成員都从事生产劳动；他們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强迫別人為自己劳动，并且也不从他手上去搶夺他所制造的一部分产品。大家都自願彼此帮助，并不考虑有没有报酬。在俄国，在印度，我們看到当某个农民的家庭来不及收割自己的地段上的庄稼的时候，其余的家庭就跑来帮助它，除了共同喝酒之外，不再期望另外的酬金。在这些原始的公社里不存在什么法律；他們不知道我們所称为法庭、权利和义务的这些东西。他們只服从习惯和传统。习惯的破坏者所受到的唯一的惩罚是社会的譴責；在某些印度的公社里犯罪者有时被罰自費負担供給一定数量的飲料，然后由全村人一起喝掉①。

无需靠所謂文明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任何一种惩罚制度（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的帮助，在原始的社会里統治着穩固的秩序和完全的和諧。虽然，事实上，他們也像螞蟻群一样彼此經常

① 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乔治·梅因先生写道：“最古老的酋长會議从来也不指示什么东西，——它們简单地解释說自古以来就实行这样的秩序。就字面的法学意义而言在那里既沒有权利，也沒有义务。在印度的公社里一个人受到暴力压制时，他并不抱怨个人的受辱，而是抱怨整个小小的社会秩序的被破坏。更奇怪的是习惯法不知道惩罚的措施。在那个几乎不可思議的場合，假如某人拒絕服从會議的决定，对他的唯一的无疑的惩罚只是一般的譴責。”——《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

处于战争状态中。一切外来者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这种思想趋向主要表现在拉丁字 *hostis* 上面，它同时意指敌人和异乡人（法文 *hôte*——客人和 *hostilité*——敌意，都是由拉丁文的 *hostis* 而来）。

只是因为原始人类社会是在压制一切个人的利己主义、一切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的人为环境中发展起来，所以人才能超出动物的状态。

只是当财产的集体形式开始瓦解和社会分裂为有敌对利益的各个阶级的时候，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才发生。但是在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任何时候也不采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所观察到的那种形式，而主要之点是它任何时候也不引起那里发生的同样的结果。

在蚁窝中为了执行维持蚁群生活所必需的职能，蚂蚁就分为等级、分为阶级：再生产者阶级（雌的和雄的）和无性别的阶级，后者又再分为战士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工作的执行都落在后者身上；而其余的阶级则只是必须关心蚁群的再生产和保卫它。在蚁窝中存在着这些不同的阶级对它是非常有利的。同一公社的成员这样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我们在人类社会里也能找出：不再关心自己的食物的阶级常常一开始就执行某种对公社的生活所必需的有益的职务，公社则供给他们生活资料。在音节文字发明以前的时代，在犹太人、印度人、埃及人、高卢人等的神权政治里，僧侣是传统和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保存者。他们管理社会的财产和执行对工作的共同的监督。欧洲和亚洲的封建贵族的秩序开始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民私有者服从于封建领主的政权并且有义务向他以自然物品或徭役缴纳租税，以换得庇护和防御周围许许多多敌人的侵犯。领主必须要有坚固的城堡，在这里面农民当受到攻击时，可以掩护自己的家畜和收获物；此外，领主还必须维持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来保护自己的城堡免受攻击。恩格斯非常正确地看出，“分工的规律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基础”①。

可是摆脱了劳动的高等阶级往往滥用自己的优越的地位，而这种滥用愈来愈成为有害的和不能忍受的，以致他们过去曾经担任过的有益的职能由于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逐渐失掉自己的意义。所有他们都诉诸于暴力和抢掠，狡诈和欺骗，为的是靠损害劳动阶级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把社会的指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在自己发生时是有益的和有良好作用的高等阶级往往最终变成有害的和压迫的阶级。

高等阶级把对其余人口的统治权夺取到手之后，他们又靠巧妙地组织起来的智力的和体力的横暴行为来保持这个统治权。在以前的演讲中我曾指出，当资产阶级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它曾经是伏尔泰式的，一旦政权落入他们之手，就立即沈溺于假仁假义的行为里去；我也曾指出，资产阶级怎样发明了具有新的神——进步、自由、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规律等等——的自由的宗教，和他们怎样最后试图批准自然科学的权威对劳动阶级的社会的屈辱。贵族阶级在当年曾完成了这样的一些进化：虽然有过教皇与皇帝之间、诸侯与主教之间、城堡与教会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却联合起来共同地从精神和肉体上压迫城乡劳动者。随着统治阶级的毫无用处日益成为明显的事实，被压迫阶级日益强烈地和明白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的赤裸裸的肉体的横暴行为（军队、警察、审判官、刑法典等等）不断增长起来。下层阶级只有当它消灭统治阶级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横暴行为，当它在开始手拿武器的斗争之前就进行一场有准备的意识形态的战争的时候，才能达到自己的解放。

为了对付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武装起义，统治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尽管有使他们分裂的内部矛盾。在1848年和1871年，我们看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243页。——译者注）

到了資產階級的一切政黨為了共同鎮壓人民的起義而形成臨時的聯合。但是統治階級政黨的鬥爭是純粹表面的現象，非常微弱地反映着那種充滿它內部的不停的鬥爭。事實上，如馬克思所說：“如果說現代資產階級的全體成員由於組成一個與另一個階級相對立的階級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於他們互相對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對抗的。這種利益上的對立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產生的”^①。

工業的和商業的競爭，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这个基本的教條，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之間的宣戰。這個戰爭不可避免要引起對戰敗者的剝奪，把他們排擠到無產階級的队伍里去，並且引起社會財富集中到數目很少的人的手里。結果，在資產階級所積累的財富增長的同時，資產階級本身的數目却不斷減少而愈來愈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貴族階級經歷過相同的階段。封建諸侯的不斷的戰爭引起他們的互相消滅。失敗者的土地和軍事力量分別增加了勝利者的軍隊和財產。貴族階級由於它的成員這樣不斷地脫離隊伍，最後已經稀少到不費力氣就可以推翻它的統治的程度。^②

動物中的生存競爭促使個體的質的提高和種的改善，而在人類社會里生存競爭却不能改善個別的人，反而會毀滅統治階級的队伍和準備它的消滅。

隨着解脫勞動的階級在人數上的減少和轉變為寄生者和壓迫

① 卡尔·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對普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學〉的回答》，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55頁。——譯者注）

② 拉法格在這段論述中，從正確的前提出發却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的鬥爭以及他們當中的分化，固然會削弱他們的力量，但是當被統治階級起來推翻他們、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們又會表現出利益上的一致。不經過被統治階級的嚴重的革命鬥爭，統治階級是決不可能輕易退出歷史舞台的。其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過就足以證明拉法格所謂“不費力氣”就可以結束貴族階級的統治這一論點是不正確的，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譯者注

者階級，被壓迫的階級不斷增長，並吸取對社會進行經濟指導和政治指導所必需的一切精神力量；兩個階級之間的對抗日益增強並由內戰的爆發而公開破裂。這對抗在中世紀產生農民戰爭和城市的暴動，為封建階級的垮台作準備。它在我們的時代則產生經常破壞經濟生活過程的罷工和動搖政治秩序的工人暴動。帶有極端殘酷和恐怖的內戰標誌着階級矛盾的最高峰；國家政權的奪取成為解放被壓迫的、革命的階級所必需的条件。

國家成為堡壘，在那裡躲藏着由於自己的成員的人數減少和完全的萎靡不振(*imbécillité*)^①而不能自衛的統治階級。

國家變為施行精神強制和肉體強制的機構，統治階級需要用它來保持自己的統治和把勞動群眾控制在現存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從屬的(奴隸制的、農奴制的、僱傭勞動的)条件之下。當社會分裂為敵對的階級的時候，就是說當還有需要控制某一階級的時候，國家的存在是必需的，這種必要性既不能為自由貿易的聖水，也不會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咒語所消滅。被壓迫的階級現在是革命的階級，應當掌握國家機器，按照自己鬥爭的需要改造它並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轉向對付敵對階級。

在前一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這個階級只是在奪取了國家機器，改造它和利用它的全部力量來鎮壓貴族和僧侶的反抗的時候才獲得自己的解放。但是就在這時候，儘管資產階級侈言什麼平等和博愛，它畢竟是剝削勞動群眾的階級，因此它不能消滅國家，相反地，它使國家更加強化，而從它取得政權之初期，它就利用國家來鎮壓人民暴動。國家政權只有那個消滅階級的階級才能消滅。而階級只有當經濟利益的矛盾解決了的時候，當產生這

① 我在這裡是按照最初的拉丁文的意義使用 *imbécillité* 這詞。*Imbecilitas* 在拉丁文中意指缺乏戰鬥力。喪失軍人的英勇是接近死亡的階級的最準確的標誌之一。

些矛盾的私有财产轉变为全民的或公有的财产的时候，才能消灭。

恩格斯写道：“当不再有需要加以压迫的阶级的時候，当阶级統治和根源于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镇压的必要性就消失了，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資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对人的統治将让位給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自由的社会不会容忍在自己和自己的成員之間存在着国家。”^①

我們看到前此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社会生产不很发展的命定的后果。凡是在社会劳动只能提供勉强超过社会全体的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产品数量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劳动吞沒大多数社会成員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在那里阶级的划分是必不可免的。与那个主要依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一起同时形成一个少数，他們解除了直接的生产劳动和从事于关涉全社会的事务；对劳动过程的总的监督，行政管理，防卫工作，法庭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創造等等。

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非常的发展，这种阶级的划分，在那个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是依社会的和科学的方法来調节的社会里将不复需要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們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現了。”^②（恩格斯，同上书）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2頁，引文与《全集》譯文有出入。——譯者注）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4頁。——譯者注

懶惰權

(駁斥《勞動權》，1848年)

前 言

在1848年，梯也爾先生在初等教育組織委員會的會議上說：“我想加強僧侶們的影響，因為我考慮到他們將傳播那種教導人們說人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受苦的健康的哲學，而不是傳播那種相反地告訴人們說你享受罷的哲學”。在體現着資產階級的粗魯的利己主義和局限的智慧的梯也爾先生的這些話里概括了它的道德。

當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反對為僧侶們所支持的貴族的時候，它舉起了自由的科學和無神論的旗幟，但是一旦取得勝利，它就背叛自己的諾言和自己的意願；在現代它則力圖用宗教來支持自己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統治。在十五至十六世紀它興高彩烈地抓住多神教的傳統並贊揚受基督教斥責的肉欲及肉欲的享樂；在我們的時代，因為沉溺於奢侈和玩樂之中，它就放棄自己的思想家拉柏雷和狄德羅的學說而向無產階級宣傳節欲。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可憐的翻版，用咒罵來破壞工人的肉欲；它樹立自己的理想就是把生產者的需要降到最低限度、窒殺他們的一切感情和一切情欲並且使他們命定只起片刻不休息地進行工作的機器的作用。

革命社會主義者必須開始資產階級的哲學家 and 作家所進行過的那種鬥爭；他們應當去冲破資本主義的社會理論和道德；他們應當在應召參加戰鬥的階級的腦子里消滅掉統治階級教給他們的偏見；他們應當向一切道德的偽君子當面宣布地球上將不再有工人

的悲慘生活，在我們行將創造的，“假如可能的話，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只是用暴力來創造的”，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的激情將獲得完全的自由，因為“所有激情本身都是好的，一點也不應當濫用它們”^①，而激情的濫用只有靠它們的互相的平衡，只有靠人的機體的和諧的發展才能消滅，據貝多博士說：“因為只有當人們達到高度的肉體的發展的時候，他們也將達到自己精力和道德力量的高度的發展”。偉大的博物學者達爾文也有這樣的見解^②。

我們對於一切，除了愛情和飲食，對於一切，除了懶惰，都懶得去管。

——萊辛。

I

毀滅性的教條

奇怪的狂行抓住了那些資本主義的文明統治着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正是它，這種狂行，產生出一切兩世紀以來折磨着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這種狂行就是對勞動的愛，對勞動的瘋狂的酷嗜耗竭人們及其後裔的生命力。牧師、經濟學家和道德家不去反抗這種狂妄的謬見，却宣布勞動是神聖的，把它變成為宗教儀式。人們是盲目的和局限的，他們却想比自己的上帝更聰明；人們是軟弱可憐的，他們却想恢復他們的上帝所詛咒的東西的名譽。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不是經濟學家，——要把他們的決定向他們的上帝的法庭控訴；拿他們的宗教的、道德的、自由

① 笛卡兒，《精神的激情》。

② 貝多博士，《人類學會誌》，查理·達爾文，《人類的由來》。

思想的宣传向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的恶果控訴。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精神的退化和肉体的畸形的根源。請拿罗特希尔德的馬厰的純种馬——有一伙有两只手的奴隶給它服务，——同呆笨的諾曼底的劣馬——它要耕地，拖拉肥料，运送收割下的庄稼，——比較一下。請看一看高尚的野蛮人，——商业的传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銷員还没有与基督教一起使他习惯于梅毒和热爱劳动，——并且拿他同我們的不幸的机器的奴隶比一比^①。

假如我們想在我們的文明的欧洲找出原始人的美的痕迹，那末我們就需要求之于那些經濟的偏見还没有根除憎恨劳动的民

- ① 欧洲的研究者对那些尚未受培皮所称的“文明的有毒的吹拂”沾污过的原始民族的肉体的美和驕傲的姿态惊叹不已。說到太平洋群島上的土人时，肯勃尔伯爵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使人在一瞥之下能产生更深的印象。他們的光滑的略帶銅色的皮肤，他們的金色的、卷曲的头发，他們的紅潤的快乐的的面孔，一句話——所有他們的外形都表現为一个真正的人 (genus homo) 的好样子；他們从自己的形态上使人产生一个比我們更高的人种的印象。古代羅馬的文明化了的人，像愷撒和塔西佗，也以同样的贊叹去看待属于共产主义部落、侵入羅馬帝国的日耳曼人。像塔西佗一样，薩尔維安，五世紀的牧师，外号叫年长的主教，他向文明化了的基督教徒引举半开化人作榜样，‘在半开化人中間，我們是些淫佚放蕩的人，他們比我們貞节。不仅如此，我們的淫蕩生活是对野蛮人的侮辱。哥特人不能容忍在自己人中間有淫蕩的同部落人，只有羅馬人在他們中間享有不光荣的特权，有放蕩之权。’(好男色当时在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間很流行。)”“被压迫者去到半开化人那里寻找仁爱和避难所” (《De Gubernatione Dei》)。古老的文明和新生的基督教毀坏旧世界的半开化人；衰老的基督教和現代的資本主义的文明毀坏新世界的野蛮人完全是一个样子。

即使不能同意弗·勒-勃萊的沾染了博爱精神和基督教的普魯东主义的社会学結論，但也得承认他是一个有天才的观察者，他在 1885 年写的著作《欧洲的工人》內說：“巴什基尔人(烏拉尔山亚洲这一面的半游牧的畜牧民族)的爱懶惰，游牧生活的閑散以及由它在人們身上引起的比較善于冷靜观察的习惯常常賦予他們举止优雅、智慧和判断的精确，这些在較发达的文明国家的同样的社会水平中很少看到……农业的工作使他們感到极端厌恶”。农业事实上是人类中的奴隶劳动的第一次的表現。照聖經傳說，第一个犯人該隱是农人。

族。西班牙，可惜它已經在退化了，還可以驕傲地說在它那里的工厂比我們这里的兵营和監獄要少些，因而艺术家当看到勇敢的、带着紅得像栗子般的面孔的、像鋼劍一样笔直而又灵活的安达魯西亚人^①而感到高兴。当你看到一个气概不凡地披着自己的千疮百孔的外套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奧苏納公爵伸手求乞的时候，你的心将因喜悅而顫动。对于西班牙人（他們当中还有原始的野蛮人），劳动是最坏的奴役^②。

就是在繁荣时期的希腊人也同样用輕蔑态度来对待劳动：只有奴隶才被准許从事劳动，自由民則只知道体操和精神的享乐。这是亚里士多德、費忌、阿里斯托芬的时代，也就是一小群勇士在馬拉松之役消灭了大量的亚洲敵軍的时代，在此战役之后不久亞力山大就侵占了亚洲。古代的哲学家劝人輕視劳动，因为照他們的看法劳动有損自由民的尊严；詩人頌揚懶惰，說这是神的礼物。詩人維琪尔^③写道：“啊，梅利貝，神賜給我們游手好閑”。

耶穌在山区的传道演說中也贊揚懶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紡綫，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罗門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④。耶和華，犹太人的上帝，給自己的崇拜者作出了理想的懶惰的最高的范例：在六天劳动之后他在第七天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劳动对什么人种來說是本性的需要？对法国的奧佛尼^⑤的居民，对苏格兰人，这些大不列顛的奧佛尼人，对哈列加斯人，这些西班牙的奧佛尼人，对中国人，这些亚洲的奧佛尼人。而在我們的社会里，什么階級为了劳动而喜爱劳动？小的农民所有

① 安达魯西亚是西班牙南部的地区。——譯者注

② 西班牙諺語說：“Descanzar es salud”（休息就是健康）。

③ 維琪尔（Vergil，公元前70—19年）是羅馬詩人。——譯者注

④ 馬太福音，VI，28和29。

⑤ 奧佛尼是法国历史上的省名，在法国中央高原，为死火山地区。——譯者注

者和小資產階級。前者侷僂在自己的土地上，后者被拴在自己的小鋪子里，他們像田鼠似的群集在自己的洞穴里，并且也像它們一樣，任何時候也不會伸直腰背來自由地享受自然。

而無產階級，這個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產者的偉大階級，這個在解放了自己之後從而就將把全人類從奴隸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使人形獸變成為自由生物的階級，這個無產階級違反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用勞動的武斷的定理來使自己蛻化！加在它身上的懲罰是殘酷的和嚴峻的：它的熱愛勞動產生出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

II

勞動的豐富多采

1770年，在倫敦出現一本無名氏的文集，名為《關於工業和商業的論文》，在當時引起很大的注意。作者是個大博愛主義者，因為下面這一點而頗感憤慨：“英國的工場手工業的平民竟發生這樣的思想，即認為他們也像所有英國人一樣，按照出生權就有比其它歐洲國家的勞動人民更自由和更獨立的特權。這種思想對於士兵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們將振奮士兵的精神和增加他們的勇敢，但是用它們來教育工場手工業的工人則愈少愈好，不論對他們還是對國家都一樣。工人不應當認為自己可以離自己的首長而獨立。像在我們這樣的商業國家里，幾乎八分之七或者全部的居民可能都沒有財產，鼓勵這種熱情是極度危險的。在我們的工業的貧民還沒有變得服服貼貼地為他們現在在四天內掙得的工資而工作六天以前，這種危險將不會完全消滅”。例如，在基佐以前幾乎一百年，在倫敦人們就公開把勞動說成是對人類的高尚的意向的箝制。“我的人民勞動愈多，他們的惡德將愈少”，——1807年5月5日拿

破命从奥斯台罗德写来的信上說。“我是当权者……所以我喜欢頒发命令让小商店在每星期日，現在也在做礼拜之后，重新開門，而让工人重新参加工作”。为了消灭懶惰和由它所产生的对自由和独立的爱好，《关于商业和工业的論文》的作者建議把所有的貧民都关进理想的工房（ideal workhouses），这些工房将变成可怕的房子。被关进去的人将在一昼夜之間坚持工作十四小时，就算除去吃飯的时间，仍然有完整的十二小时劳动。

一昼夜工作十二小时，这就是十八世紀的博爱主义者和道德家的理想！我們怎么能胜过这超等的走狗！現代的工厂成了理想的感化院，其中关进工人群众，并且在那里不仅男人，而且还有妇女和儿童都被判決要作十二到十四小时的苦役劳动①。

革命恐怖的英雄的后裔用劳动的宗教来使自己腐化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认为 1848 年的限制劳动日为十二小时的法律是革命的收获，他們把劳动法作为革命的原則。这是法国无产阶级的耻辱！只有奴隶才能忍受这样的卑視！资本主义文明的腐化的影响需要經過二十年才能使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弄到这样的卑躬屈节的地步。

假如苦役劳动的灾难和饥饿的折磨落在无产阶级身上，那末它只能怪自己。劳动，在 1848 年工人手执武器所要求的劳动，他們也把它加給自己的家庭；他們把自己的妻儿都献給工业巨头。

① 在第一次博爱主义者代表大会（布魯塞尔，1857年）上，麦卡达（离里尔省不远）的最富有的工厂主之一、斯克里夫先生在出席會議成員的热烈掌声中用充滿了責任感的声調說：“我們为儿童組織了某些娱乐活动。我們教他們在工作時間唱歌和計算。这使他們开心，于是他們就精神勃勃地担負起为了使他們能获得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十二小时劳动”。十二小时的劳动——这是怎样的劳动！——加在尙未滿十二岁的儿童的身上！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没有这样的地獄，可以把这些耶穌教徒，这些博爱主义者，这些儿童的劊子手投进去，而感到遺憾！

是他們用自己的手破坏了自己的家庭的炉灶，是他們用自己的手挤干了自己的妻子的乳房；不幸的、怀孕的或給自己的孩子喂奶的妇女必須去到工厂和矿場，在那里她們弯曲了脊背，耗尽了精力；是他們用自己的手摧毁了自己的儿女的精力和生命。这是无产階級的耻辱！她們——这些善作坦率的玩笑，有着豪放的热情和爱好我們的古老的童話和故事所讲到的神酒的妇女們，現在是在何处？她們——这些經常总是到处乱跑，总是忙忙碌碌的，經常担任做飯，嘴唇上不离歌声的，在自己周围散播生命的，对一切都欢乐的，并无病无痛地生下健康的和結实的婴儿的活泼的姑娘們，現在又在何处？

現在我們有的是工厂的妇女和姑娘——因貧血而枯萎和发白的面色，有着衰疲的胃和精疲力竭的四肢。她們不知道健康的享乐，她們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会带着青春的兴奋向你讲說激情的最初的瘋狂的突发。而儿童呢？給儿童十二小时的劳动！說些秽褻話！就是道德和科学学院的所有居利·西門們，所有狡猾的日尔米尼們都不能想出这种恶德，它像資本主义的作坊的感染了鼠疫的空气那样使儿童的智慧衰退，这样使他們的本能退化，这样破坏他們的机体！

人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时代是劳动的时代。可不是嗎，这是痛苦，貧困和衰退的时代！……

可是，資產階級的哲学家和經濟学家，从晦澀难懂的奥古斯特·孔德到庸俗明白的萊魯亚一波利埃，資產階級的作家，从招搖撞騙的浪漫主义的維克多·雨果到天真有趣的保尔·得一柯卡，——所有他們都一起唱着噁心的歌来贊揚进步之神，劳动的初生之子。听到他們的歌唱，可能会設想普遍幸福的王国正在降临人間……它的接近已可感到。他們钻到中世紀的深处，在封建的廢墟里和灾难中挖掘，好让現代的太阳在这黑暗的背景上光輝地

照射。他們老是向我們嘮嘮叨叨說不完，——這是一些吃飽了飯、心滿意足的，過去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封建主的家奴中間總是令人討厭的家伙，而現在是享受高薪的資產階級的藝術上的幫閑，——他們老是拿自己的無休無止的關於空談家拉布留伊爾^①所描寫的不幸農民的悲哀的故事向我們嘮嘮叨叨說不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那就是院士、博士維萊姆所描繪的資本主義進步時代的1840年的無產階級的幸福的光輝圖景，這位博士也屬於那些在1848年在群眾中宣傳資產階級的經濟和道德的愚蠢糊塗的學者圈子裏的人物（其中包括梯也爾、庫松、柏西、布朗基院士）。

維萊姆博士說到工業的阿爾薩斯、慈善事業和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燈塔凱斯特內爾和多爾費斯的阿爾薩斯。但是在博士向我們展示無產階級貧困的圖景之前，我們先來聽取阿爾薩斯的工場主，多爾費斯商行米格公司老板米格先生的演講，他描述了老式的工業體系中手工業工人的狀況：“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當時現代的機器工業只是剛剛產生）在牟爾豪松所有工人還是土地的親生子，住在城市和郊區農村里；他們每人都有一所小小的房屋，而有時還有一片土地”^②。這是工人們的黃金時代，然而阿爾薩斯的工業還沒有使自己的棉布充斥全世界，還沒有使自己的多爾費斯們和凱赫林們得到百萬財富。經過二十五年，當維萊姆博士訪問阿爾薩斯時，現代的米諾塔弗^③——資本主義的工廠——征服了全國；由於自己對人的勞動的貪欲，它從工人的住宅中趕走工人，為

① 拉布留伊爾（J. de La Bruyere, 1645—1696），是法國作家，在他的著作《當代的性格或風俗》（1688）中揭露了宮庭貴族和資產階級，並描述了農民的悲慘生活。——譯者注

② 1863年五月在社會經濟的實際研究的巴黎國際協會所作的演講並發表在同年的《法國經濟學家》雜誌上。

③ 古希臘神話中的牛首人身的怪物，據說密諾斯把雅典進貢的少年男女都送給他吃掉。——譯者注

的是可以更牢固地掐住他們和更好地擠榨他們的勞動力。維萊姆說：“他們的大部分，一萬七千人中有五千人，由於高房租的緣故而被迫移居近郊的鄉村。有的人的住處離開他們工作的工廠有八、九俄里之遙。

“在牟爾豪松，在多爾那赫，工作從早上五點開始，晚上五點結束，夏天如此，冬天也一樣。只有在每天早上在他們進城時和晚上出城時看到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婦女，蒼白而干瘦；她們赤腳在泥地上走，而在下雨下雪時她們就把圍裙或外裙頂在頭上保護頸和臉。在這一羣當中還有很多兒童，他們是那樣的骯髒，那樣的虛弱，蓋著一頭沾滿了在工作時從機器上滴下來的油污的蓬鬆的頭髮。這些兒童被油污而不透水的衣服很好地保護著身子，沒有像婦女一樣用籃子帶著每日的食物，而是在手裡或在懷裡放著幾片麵包，他們必須靠它來維持一天，直到回家。

“因此，工廠與家庭之間的漫長的、折磨人的往返步行，更增加了過長的勞動日——不少於十五小時——的疲勞。因此他們每晚回到家時，由於精疲力竭而只好和衣睡覺，一到早上還來不及喘口氣就得趕去工廠，以便在工廠開門的時間能夠到達”。

而這就是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所寄居的簡陋的房子：“我在牟爾豪松，在多爾那赫，在比鄰的房屋裡看到那些可憐的住所，每兩家住一個房間，每家都睡在角落裡，底下鋪了稻草，兩邊用板擋住……上萊茵省棉紡織工業工人生活的赤貧非常嚴重，因為赤貧使得在紡工和織工的家庭裡有百分之五十的未滿兩歲的兒童死亡，而在工廠主、商人、工廠經理的家庭裡有百分之五十的兒童達到二十一歲”。

說到工廠裡的工作，維萊姆補充說：“這不是勞動，不是規定期限的工作，而是苦刑，從六歲到八歲的兒童就開始忍受。這種慢性的苦刑日復一日地損害著棉紡織工業的工人”。關於工業勞動，維

萊姆指出，監獄里的苦役犯人勞動不超過十小時，古代的奴隸平均一晝夜勞動九小時；而在法國，在這個完成了宣布莊嚴的人權的1789年革命的国家，“在某些工業部門勞動日延長到十六小時，其中讓工人吃飯和休息却只有一點半鐘”^①。

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原則的可悲的破產！它的進步神的可憐的贈品！慈善家頌揚那什麼也不做、把工作讓給貧窮者而發財致富的人們是人類的美德；在鄉村居民中散播鼠疫、投毒下井，比在那裡建立資本主義的工廠還要好些。參加工廠的勞動就等於向快樂、健康、自由告別；向一切使人的生活愉快和使人的生存成為有價值的東西告別^②！

於是經濟學家不倦地向工人們反復申說：為了增加社會財富，你們去工作罷！於是他們就這麼做，儘管有一個經濟學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回答他們說：“貧困的民族是那些人民生活得很好的民族，而富有的民族是那些人民很貧困的民族”，而他的後繼者肖爾賓利埃補充說：“工人本身……，在促成生產資本的積累時，也促成遲早會剝奪他們的工資份額的這些條件的形成”。但是由於自己的不吉利的話而發呆和變得遲鈍了的經濟學家反駁說：“為了給自己創造福利，工作罷，工作罷！”於是英國的牧師聖陶遜德用基督

① 維萊姆，《絲綢、毛紡和棉紡工廠工人的身體狀況和道德狀況景象》（1840年）。多爾費斯、凱恩林和其他阿爾薩斯的工廠主並不因為他們是共和主義者、愛國者和新教的博愛者而如此關心自己的工人；布朗基院士，拉伊巴、熱羅姆·柏杜羅的影射人物，居爾·西門指出在利爾和里昂的一切天主教的工廠主那裡的工人階級的相同的福利。這些資本主義的德行同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信念和睦相處。

② 巴西的好戰部落的印第安人殺死自己的病人和老年人，結束生命與戰鬥、節日和舞蹈的快樂相伴而行，他們用這個來表現自己的友誼。一切原始民族都把這個愛的物證贈予自己的親屬，——里海附近的馬薩蓋特人（希羅多德）是如此，日耳曼的維納人和高盧的凱爾特人也是如此。在瑞典的教堂里不久以前還保存着粗木棒，稱為傳家棒，是用來解脫雙親的衰老之憂的。假如現代的無產階級忍耐地承當工廠勞動的可怕的折磨，他們將退化到什麼程度！

教的仁慈的名义宣传說：“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你們在劳动时增加了自己的貧困，而你們的貧困將使我們不需要靠法律的力量来强迫你們工作。凭借立法手段来强迫劳动将带来过大的困难、暴力行动和各种喧嚷，其实飢餓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經常的压力；它作为工业和劳动的自然的动因，也引起最大的紧张。工作吧，工作吧，无产者，为了增加社会的財富和你們的个人的貧困，工作吧，工作吧，为了变得越来越貧困，因此有更多的理由工作和忍受困难。資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就是如此！”

正是工人們，当听从了經濟学家的花言巧語时，就拿精神和肉体去服从劳动的恶德，使社会遭受到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这危机又使社会机体战栗。正是那个时候，——因为商品过剩，而购买者少，——工厂关门，于是飢餓就用自己的成千条皮鞭抽打工人居民。被劳动的教条弄糊涂了的无产阶级不懂得他們在所謂工业繁荣时期借以耗尽自己精力的剩余劳动正是他們真正貧困的原因，并没有跑去粮庫喊叫着說：“我們餓了，我們要吃！……的确，我們身边一錢莫名，我們虽然是叫化子，然而須知正是我們收割了粮食和葡萄”……沒有去包围波恩的商号、工业的修道院的发明者約須里埃并喊叫着說：“波恩先生，这是你們的捻工、紡紗工和織布工来了；她們穿着千疮百孔的印花布連衫裙而冷得发抖，看到这种裙衣甚至连慳吝人也会落泪，然而正是她們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娼妇紡織了絲綢的連衫裙。这些可怜的女人一昼夜工作十三小时，沒有功夫关心自己的衣飾打扮；現在她們失去了工作，得閑了和有可能来穿上她們以前做的漂亮的絲綢織物。从她們失去乳齿之时起，她們就为你們工作，让你们自由自在地生活，而她們自己則过半飢半飽的生活；現在她們得閑了，想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因此，波恩先生就得拿出自己的絲綢織物，阿梅尔先生就得把自己的薄紗带来，平内先生就得把自己的为冻透和湿透的脚穿的鞋子带

来，……从头到脚都打扮起来，穿得漂漂亮亮的，她们就会变得很美，以致使你们将对她们大为欣赏。就这么办吧，你可不要躲开，——你是慈善家，此外还是基督教徒，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应当把女工们用耗竭他们的骨髓的苦役劳动为你们创造的全部财富奉还她们。难道你不爱商业吗？那末你就应当这样来促进商品的流通；这就是为你们准备好的顾客；你只应当给她们发放无限制的贷款。你本来应当给你第一次见到和前此并没有从她们手上取得一文钱的商人们发放贷款。你的女工们会尽可能同你清账，而假如她们的诺言不能如期兑现而迫使你表示抗议，那末你就宣布她们是破产者，而假如从她们那里查抄不到什么东西，你就要求她们拿祈禱来偿还你；你应当相信，她们会比你们的卑污的牧师更快地给你准备好天堂”。

餓腫的工人們不去利用危机的时期并把現成的产品分配給大家，不因普遍的必需的休息而举办普及的娱乐，却用头去撞工厂的大門。他們，这些干瘦的、疲憊不堪的人們，包围着工厂主，哀求說：“好心的謝加先生，仁慈的希納德先生，給我們工作罢，折磨我們的不是飢餓，而是对劳动的热情！”于是这些不幸的、勉强站立得住的人們，就比以前低廉一半来出卖十二至十四小时的劳动，在以前的时候他們的籃里还有面包。于是工业的慈善家就利用工人失业来进一步降低自己的生产費用。

假如紧跟着生产过剩周期的工业危机，正像白昼紧跟着黑夜一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被迫失业現象和无止境的貧困，那末它也引起殘酷的破产。当工厂主得到貸款时，他就开足馬力进行工作，他到处借貸，为的是要拿原料供应工人。他进行生产，却没有想到市場已經裝得滿滿的了，也沒有想到他的商品如果卖不出去，他的諾言将不能兌現。由于产品卖不出去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只得跑去求銀行家，跪在他的脚下，献出自己的血，自己的榮譽。罗特

希尔德回答说：“对于我来说即使有少許的金子也远为重要，看你们在商店里存着二万双袜子，一双值四十戈貝克，我将用八戈貝克一双把它们买进”。得到袜子之后，銀行家以十二到十六戈貝克一双卖出，因而賺去大量金光閃閃的錢币；而工厂主則陷于更大的困境。最后，商店存貨充斥达到最高限度时便面临破产的到来，而这时从商店的窗戶里抛出去的商品有那么多，以致很难想像它們是怎样通过大門进去的。于是商品就全部被消灭了，有时达亿万件之多；在十八世紀干脆把它们燒毀或抛进水里去①。

但是在决定这样做之前，工厂主先要在全世界为积压的商品寻找市場；他們要求自己的政府吞并刚果，侵占东京（指越南北部——譯者），用大炮来轰毀中国的长城，只是为了推銷自己的棉織物。在最近几个世紀，英国和法国为了爭夺在美洲和在两个印度出售自己商品的絕對权，彼此之間进行不断的殊死决斗。成千上万的青年、壮丁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殖民战争时期會用自己的血染紅了海水。

資本也像商品一样发生过剩。金融資本家不知道向何处投放；于是他們就把資本打发到那些一面抽烟、一面在太阳底下取暖的幸福的民族去，还用它們修建铁路，兴建工厂和制造劳动的詛咒。这种資本輸出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外交的糾葛”而告終；例如在埃及，法国、英国和德国因为哪一国的高利貸者最先取得自己的錢而几乎彼此抓住头发不放；有时还得用軍隊来解决，例如在墨西哥，在那里法国的士兵为追償可疑的債款起了民事执行吏的作用②。

① 1879年1月21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业家會議上德国铁路工业在最近的危机时期的損失估計达五亿六千八百万法郎。

② 克雷蒙梭的報紙《正义》1880年4月6日在自己的金融栏里写道：“我們听到一个意見，认为假如沒有普魯士，1870年战争的几十亿对法国來說反正也会在为平衡国外預算而定期发放的貸款形式中損失掉；我們同意这个意見”。英国資

这些社会的和个人的灾难，不管它們是多么大和不可估量，也不管它們看来是无止境的和无出路的。只要无产階級說一声：“我願意”，就会像鬣狗和胡狼遇着獅子一样悄悄溜走。但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力量的理解，无产階級应当消灭自己头脑中的基督教的、經濟的和自由主义的道德的偏見，应当回到自然的本能和宣布懶惰的权利，它比資产階級革命的形而上学的律師所烤出来的人的干瘦的权利要高貴和神圣一千倍；他应当强迫自己劳动一昼夜不超过三小时，以便把其余的时间用来閑蕩和娱乐。

到此以前我的任务是輕而易举的：我曾必須叙述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实在的恶。但是要使无产階級相信：人們使他們习惯了的道德是一种腐化墮落的道德；他們从十九世紀之初就投身于其中的那种不受遏止的劳动是最坏的灾害，总有一天会杀死人类；只有到劳动将被正确組織起来和限制在一天三小时之內的时候，它才成为懶惰的愉快的調料，对人体有益的鍛炼，对社会机体有益的癖好，——要使无产階級相信所有这些，是很困难的任务，它超过了我的能力。只有共产主义者——生理学家、卫生学家、經濟学家——才能胜任。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只是想尽力证明在現代的生产資料和它們的无限的生产力之下，需要遏止工人对劳动的不合理的热情和責成他們消費他們所生产的商品。

III

生产过剩产生什么

希腊詩人安蒂帕特，西塞罗的同代人，贊揚过磨碎谷粒的水磨

本在北美各共和国贷款中所損失的數目計达五十亿之巨。法国的劳动人民不仅生产了支付給俾士麦的五十亿，而且还繼續給各种各样引起战争和失敗的奧利維埃、吉拉尔登、巴贊和其他食利者支付賠償战争損失的利息。但是留給他們的是微小的報酬，这个几十亿不会引起賠償損失的战争。

的发明。照他的意見，它应当解放女奴隶和恢复黄金世紀：“爱护你們的手吧，磨坊的女主人，过安逸的生活罢！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曉吧！丹熬把女奴隶的工作加在山林水泽女神身上，于是她們就挨着輪子輕輕跳动，而开动的軸子連同輻条一起旋轉和促使沉重的石头旋轉。我們將过着我們的父輩的生活，不劳动而享受女神賜予我們的礼物”。

唉！多神教詩人所宣布的閑暇時間並沒有来到；对劳动的盲目的、誘人为恶的、有害的热情把机器这个解放者变成奴役自由人的工具；机器的生产率是大众貧困的原因。

手巧的女工靠編花边用的小木軸的帮助，一分钟之內可以編五个活結，而某些編織机在同样的時間內可以編制三万个活結。因此，机器每一分钟的工作等于一个女工一百个小时的工作，或者換句話說，机器每一分钟的工作有可能让女工休息十天。对花边編結的这种看法用在其它現代技术装备的工业部門上也多少是正确的。但是我們在实际上看到的又是什么呢？随着机器改善的后果，它的工作的速度和精确性也增长起来，随着机器的日臻完善和它的工作的不断发展的速度和精确性排挤掉劳动，工人加倍尽心竭力的是好像想要同机器竞赛，而不是怎样增加自己的閑暇。多么愚蠢的和有害的競争呀！

为了让机器和人之間的競争留有余地，无产阶级消灭了限制旧行会手工业者的劳动的合理的法律和取消了节日^①。他們是否

① 在旧的制度之下，教会的法令保证工人一年有九十個假日（五十二个星期和三十個节日），在这期間劳动是严格禁止的。这被视为天主教的严重罪行和成为工商业资产阶级不信宗教的主要原因。一旦革命到来、后者取得政权，它就废除了节日，并且把一星期七天变成十天，让人民在十天中只能享受一天的休息。它把工人从教会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为的是让他们服从更坏的劳动的压迫。对节日的憎恨只是从現代工商业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之时，即十五和十六世紀之間，才表現出来。亨利四世曾請求教皇减少节日的数目，但是被拒絕

以为，当那时一星期只劳动五天的时候，生产者曾經靠水和空气过活，像虛伪的經濟学家所設想的那样？但願不是这样才好！他們有閑暇来享受大地的快乐，娱乐和恋爱，有閑暇来組織愉快的庆节以祝賀带来快乐的游手好閑之神。黑暗的、現在是塗上了新教的釉的英国，当时被称为“快乐的英国”(Merry England)。当我们从拉伯雷、凱維多、塞万提斯和其它不知名的作者的著作中讀到描写盛大筵宴^②的窃賊小說，——筵宴是在两場战斗的間歇期間举行而且是“不惜一切”的，——我們就会垂涎三尺。約当斯和法兰德斯画派很好地在画布上把他們表現出来。非常貪婪的胃，你們藏到哪里去了？包含着一切人类思想的奇妙的头脑，你們又在何处？——我們实在是消瘦了，退化了。經常的挨餓，馬鈴薯，用顏料染紅的酒和普魯士的烧酒，錯綜复杂地同苦役劳动結合在一起，削弱了我們的机体和使我們的头脑变得愚鈍。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即当人們縮小自己的胃，而机器却在扩大自己的生产率的时候，經濟学家来向我們宣传馬尔薩斯的理論，节欲的宗教和劳动的教条？应当撕下他們的舌头并且拿去喂狗！

正因为工人階級精神上的淳朴易受愚弄，因为它帶着天生的

了，因为“現时代的异端邪說之一恰恰涉及节日”（《紅衣主教得·奧薩的书信》）。但是在1666年，比萊菲克斯，巴黎的大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废除了十七个节日。新教，——一种适合于新兴工商业資產階級的基督教，——不很关心人民的休息。它把天上的圣徒推翻，以便废除他們在人間的节日。宗教和哲学的自由思想对于貪婪的狡猾的資產階級只是作为偷窃民間节日的一种借口。

- ② 这些快乐主义者的庆祝筵宴曾連續几个星期。堂·罗德里戈·德·拉腊借助于把摩尔人从古老的卡拉特拉瓦赶出去才得到自己的新娘，于是《罗曼塞罗》（西班牙民間詩歌集的名称——譯者）說：

“婚礼是在布尔果斯，从婚礼回到薩拉斯；参加結婚庆祝宴会和回来要經過七星期。到場的人多得沒有地方容納……”

这些延續七星期之久的結婚庆祝宴会的参加者有独立战争的英雄士兵。

热情盲目地沉溺于劳动和节欲，资本家阶级才被注定承担不得已的懒惰和吃喝玩乐，承担不事生产和无限度的消费。但是假如工人的过度劳动禁绝他的肉欲和折磨他的神经，那末它带给资产阶级痛苦也不轻。

生产者阶级注定的节欲责成资产阶级专心于它毫无秩序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无限度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开始时，即在二百年前，资产者是有着合理的和和睦的习尚的可敬的人，他满足于自己的一个妻子，当感到口渴时，他就喝，当饿了时，他就吃。他把放荡生活的高贵美德留给宫廷宠臣和高等妓女。现在却没有这样的暴发户，他不认为有必要支持卖淫行为和用水银填满自己的机体，为的是让水银矿里的有害劳动具有某种意义；没有这样的资产者，他不把烤阉鸡连同地菇和拉斐特酒一起装满肚皮，为的是鼓励拉斐特的养鸡家和波尔多的造葡萄酒专家。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下机体很快就被破坏，头发稀少，牙齿掉落，躯干弯曲，肚子膨胀起来，呼吸发生困难，动作变得笨拙，骨节的联合失掉自己的弹性，关节硬化，而风湿病和痛风为自己结成坚固的巢穴。而别的人要来消灭这种浪荡的生活是太软弱了；但是那些在学术上舍本逐末的有才干的人们，绞干自己的脑汁，例如政治经济学中的哈尔涅先生，法哲学中的阿柯拉，写出大量的催眠的著作来剥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闲暇。

上流社会的妇女也过着殉难者的生活。为了夸示迷人的服装（为了缝制它，女缝工得了肺结核），她们必须从早到晚换穿一件又一件的连衣裙；在整整几小时里她们让自己的头脑去受灵巧的理发师的摆布，他接受了大量的钱而在她们的头上加上一个用别人的头发制成的精致的发髻。穿上紧身衣，穿上窄小的鞋，裸露到使任何一个近卫军人都会羞得脸红，她们到慈善的跳舞晚会上去度过夜晚，为的是给穷人募集几个铜板。神圣的伟大的女殉

难者！

为了执行自己的双重的社会职务——非生产者和过度的消费者，资产者不仅必须勉强扩大自己的朴素的胃口，放弃自己的旧的爱劳动的习惯并献身于无限制的奢侈和淫荡，而且还必须使大批的人群脱离生产劳动，以便为自己找到助手。

这里有一些数字，它可以说明生产力的损失有多大。据 1861 年的调查，英国和威尔斯的总人口达到 20,066,244 ①人，其中有男的 9,776,259 人，女的 10,289,965 人。假如撇开过老和过幼不适劳动的人，一切“不参加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知识阶层”，例如官吏、宗教人士、律师、战士等等，最后还撇开所有那些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下以吃别人劳动为专门职业的人，那末留下两性和全体成年人口的整数是 8,000,000，包括在生产和在商业中担任职务的一切资本家。这 8,000,000 人中计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为农场主服务的雇工、 女仆).....	1,098,261 人
纺织工人.....	642,607 人
采掘工业工人.....	565,835 人
冶金工人.....	396,998 人
仆人.....	1,208,648 人

把纺织工的数目同采煤工和矿工的数目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总数 1,208,442 人，再把前者同冶金工人加在一起，总数则为 1,039,605 人，这就是说，在两个场合之下都少于现代的家庭奴隶的数目。“资本主义利用机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呵！”②对于这整个服务的阶级(它的人数的的大小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程度的标

① 数字有误，男女相加应当是 20,066,224 人。——译者注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390—391 页。《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80 页。——译者注

志)，我們还应当加上一个为数很大的不幸者阶级，他们从事于满足富有者阶级的无益的和浪费的口味，例如钻石的磨工，花边女工，绣金女工，时装女成衣工等等①。

一旦陷入游手好闲和被必需的享乐败坏了的资产阶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它终于适应了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不但如此：它已经连想到任何改变的可能性都不能不感到恐怖。而工人阶级所顺从地接受的骇人听闻的生存条件的景象和追逐劳动的病态的热情所造成的器官的退化，更加加强资产阶级对一切义务劳动和对任何对它的享乐和放荡生活的限制的厌恶。而恰恰就在这时候，完全没有顾及资产阶级当作社会义务来承担的那种放荡生活，无产阶级忽然想到强迫资本家参加劳动。头脑简单的人们当真采纳了经济学家和道德家关于劳动的理论，并且拚命地努力去强迫资本家参加劳动。无产阶级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1831年的里昂起义提出**不死就得劳动**的要求；1848年的6月武装起义者要求“**劳动权**”；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宣称自己的起义是**劳动的革命**。

对这些想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无所事事和资产阶级的享乐的野蛮的狂行的暴动，资本家报之以残酷的迫害，是毫不足怪的。他们知道，假如他们镇压这些革命的爆发成功的话，他们仍然不能使无产阶级想强迫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们劳动的愚蠢愿望淹没在他们所流的血泊里。正是为了预防自己陷入这种不幸，他们用宪兵队、警察、军队、法庭、狱卒来保护自己，他们使这些爪牙从事一切令人厌倦的而又不生产的工作。在现时代常备军的职务对一切

① “一个国家的人口充当富有阶级的僕人所占的比重标志着它的民族财富和文明的增长程度。”（马尔丁，《加入联邦前后的爱尔兰》，1818年）。甘必大，从他不再是普罗科普咖啡馆所需的律师之时起，他就否认社会问题，当说到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时，他无疑地看到这个日益增长的僕人阶级。

人都很明白：它之所以是常备的，是为了准备对付“内部敌人”。例如，巴黎和里昂的工事修筑起来不是为了保护这两个城市免受敌人袭击，而是为了在发生暴动时镇压它们。

比利时是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它提供了谁也不能否认的很好的例子。它的中立地位受到欧洲列强的保证，可是那里的军队同人口的数目比起来是很大的。在波里纳日和谢尔鲁阿平原上曾发生过勇敢的比利时军队的著名的战役；在矿工和手无寸铁的工人的血泊里，比利时的军官磨快了自己的长剑和为自己获得带穗的肩章。在欧洲没有国民军队，而只有雇佣军队，于是他们就保护资本家防止人民的愤怒，因为人民想宣判资本家在工厂和矿山作十小时劳动。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一面使自己遭受穷困，同时又无限度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食欲，资产阶级因此被迫从事过度的消费。

为了让自己减轻这项繁重的工作，资产阶级从工人阶级中抽出一批人，为数比那些从事有益劳动的要多得多，并且使他们全体注定不从事生产而只是作无限度的消费。但是，虽然这群无益的嘴贪食无厌，也不能消费掉工人所制造出来的全部产品，这些工人们像给劳动的信条迷住了心窍的躁狂人，一味生产商品而不想消费它们，也不想到是否能为它们找到消费者。

从工人的双重的发狂行为中，即从渴求无限度的劳动中和愿意在节制食欲马马虎虎混日子中产生这样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问题不是操心如何找到生产者和增加他们的力量，而是操心如何发现消费者，刺激他们的胃口和为他们发明人工的需要。既然欧洲的工人一面因饥寒而发抖，却又拒绝穿着编织好的衣料，饮用制好的酒，贫困的工厂主就不得不去寻求性格相反的人们并在那里寻找应当穿着这衣料和饮用这酒的人们。欧洲每年把几十亿件商品运到世界各地去供应各族人民，而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拿它

們怎么用①。

但是已發現的大陸不夠寬大，他們需要未開墾的國家。歐洲工廠主日夜夢想着非洲，夢想着撒哈拉大沙漠中的湖，夢想着穿過蘇丹的鐵路；他們忐忑不安地注視着李溫斯頓、斯坦利、謝尤、布拉察的勝利；他們驚得目瞪口呆地聽着這些勇敢的旅行家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這塊“黑色的大陸”隱藏着多少尚不知道的奇蹟！大地上布滿象牙，椰子油的河流充滿金沙，成千上萬的黑人，裸露得像杜弗或吉拉爾登②的頭顱，期待着歐洲的印花布，以便學會羞恥心，期待着一瓶一瓶的燒酒和聖經，以便熟悉文明的美德。

但是所有這些是不夠的：貪食的資產階級，在數量上超過生產者階級的服務階級；被歐洲商品淹沒的外國民族和半開化人，——所有他們合在一起也無力消費這些堆積如山的商品，它們在宏偉和高度上都超過埃及的金字塔；歐洲工人的生產率無止境地超過一切的消費和浪費。工廠主驚慌失措，陷入絕望的狀況；他們越來越感到原料不夠，不能滿足自己的工人對勞動的狂熱。某些工廠主收買舊的半腐爛的毛織的連衣裙并用它們製造呢絨，稱之為再生(renaissance)，其牢固的程度正如議員們在選舉前所作的諾言那樣；在其餘的工業部門也發生同樣的情況；所有的產品都摻假，為的是便於推銷和減少它們的牢固性。我們的時代將稱為造假的世紀，就像人類存在的最初幾個世紀按照他們生產的方式而稱為石器世紀、青銅世紀那樣。不明事理的人指責我們的虔誠的工業

① 這裡有兩個例子。英國政府為了討好印度農民，——他們雖然經常遭遇到破壞全國的荒年，却仍然堅持種植罌粟而不種大米和谷物。——曾不得不挑起流血戰爭來迫使中國政府自由地輸入印度的鴉片。為了消費蘇格蘭葡萄酒釀製廠和曼徹斯特紡織工廠的產品，玻里尼西亞的野蠻人會被迫穿棉織物和喝得酩酊大醉，雖然喝醉的結果會死掉。

② 杜弗(1780年—1865年)，法國的昆蟲學家。吉拉爾登(1806年—1881年)，法國的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譯者注

家弄虛作假，其实使他們感兴趣的只是一个思想——給工人工作，工人不劳动就活不下去。这种弄虛作假主要是从人类爱的动机引起来的，它給采用这种做法的工厂主带来大量的利潤；假如說它对商品的质量是有害的，假如說它是人类劳动浪費的无尽的源泉，那末它終究证明資产階級的人类爱的发明和工人的可怕的敗坏，因为工人为了滿足自己对劳动的热情，就迫使工业家昧着良心去破坏商业誠实的法律。

虽然商品生产过剩，虽然有工业中的弄虛作假，大量的工人終究还是充滿市場，他們呼吁：工作！工作！工人的数量这么多，却没有迫使他們抑制自己的热情，反而把这种热情引到最高度。假如一旦預見到有工作的可能，他們就大批涌上去。为了滿足自己的热情，他們要求一天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而第二天他們又被重新拋到馬路上而失掉滿足自己的癖好的可能。年复一年地都像季节的規律性一样在一切工业部門都出現失业；跟在損害机体的过度劳动之后的是絕对的休息，連續两个到四个月，而没有劳动，就没有面包！假如对劳动的热情充滿了工人的心，假如这热情絞杀他的所有其余的自然本能，并且假如，从另一方面，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数量依照消費和原料的数量加以限制，那末为什么全年的劳动要在六个月内执行呢？把这劳动平均分配在十二个月中并强迫每个工人滿足于长年地一天只作五、六小时，而不是在一年的六个月中拚命干每天十二小时的劳动，难道这样不是更好嗎？当他們每天工作有保证时，当工人不再彼此嫉妒、不再彼此从手里夺取工作和从嘴里夺取面包时，当他們的身体和精神因此不再知道什么是疲劳时，他們就会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懶惰的美德。

工人受了自己的热情的蒙蔽，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为了让一切人都有工作，需要把它分为小的份額，好像在快要

沉沒的船上把水分散一樣。向資本主義剝削的代表者工業家本人早就要求對工作日作立法的限制。在職業教育委員會(1860年)里，阿爾薩斯最大的工場主之一布爾卡先生聲稱：“十二小時的工作日是太長了。需要把它減為十一小時，而在星期六應當停止工作兩小時。我建議採用這個辦法，雖然猛一看似乎是沉重的負擔；在我們的企业中，我們已經在四年前就實行了，並沒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損失。生產的平均數字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大大提高了。”帕西先生在自己研究機器的著作中引用一個比利時大工業家奧推維先生的一封信說：“雖然我們的機器同英國紡紗工使用的一樣，但是它們所生產的比應該生產的要少，雖然英國的紡紗工每天工作還少兩小時……我們工作却多兩小時；我相信，假如我們不是工作十三小時，而是工作十一小時，我們也會生產同樣多的東西，因而這是更節約的辦法”。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萊魯亞一波利埃斷言道，“根據一個比利時的大工場主的觀察，在一個有節日的星期中生產並不比普通一星期更少”^①。

但是，由於自己的淳樸而受了道德家蒙蔽的人民所不敢做的事情，貴族的政府卻做了。經濟學家正像不祥的烏鴉預報說，縮短工作日一小時等於英國工業的破產，英國政府不顧這些經濟學家的高度道德的和工業上的考慮，嚴格地用共同遵守的法律來禁止每天工作超過十小時，在這之後，也像在以前一樣，英國仍然是全世界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我們面前有英國的偉大的經驗，我們面前也有某些明智的資本家的經驗；這些經驗向我們無可駁辯地證明，為了增加人類勞動的生產率需要縮短工作日和增加假日和節日的數目，但是法國的人民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但是假如兩小時的可憐的縮減在十年之內使英國的生產幾乎

^① 萊魯亞一波利埃：《十九世紀工人問題》，1872年。

增加三分之一^①，那末假如把工作日縮減三小时，法国的生产岂不以更快的步伐突飞猛进？最后，难道工人不懂得当担負繁重劳动时，他們就会耗竭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后代的力量；由于衰弱，他們会过早地无力从事任何劳动；由于受自己的热情所迷醉和蒙蔽，他們已經不是彪形大汉而只是人的殘骸；他們之所以絞杀自己身上的一切优良的能力归根到底是由于对劳动的狂热？

唉！他們像鸚鵡般重复着經濟学家的教訓：“为了增加国民財富，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工作”。傻子啊！正因为你們工作做得太多了，所以工业的技术才发展得这样慢。請停止你們的叫喊而来听听一个經濟学家的意見罢；这不是什么人类的輝煌的天才，这只是路·萊巴先生：“在一般的劳动条件之下，人們調节着生产方法的变换。手工劳动当它低廉时就被使用；一旦变得昂貴，就开始縮減”^②。为了迫使資本家改善他們的用木料和铁制成的机器，需要增加工資和减少用骨头和血肉制成的机器的工作日。需要拿证据給你看嗎？几百个也可以举出来：在紡紗工业中自动車床发明出来和在曼彻斯特采用是因为紡紗工工作時間同以前一样长。

在美国，机器席卷农业的一切部門，从制油到谷物的除草。为什么？因为自由和懶惰的美国人宁願死一千次也不願过法国农民那样的牛馬生活。农业劳动，在我們光荣的法国是如此令人厌倦，而在美国却是在新鮮空气中愉快的消磨光阴。农人一面执行自己的工作，一面无忧无虑地坐着抽烟。

① 这是根据英国著名的統計学家日·吉芬魯所提供的英国和爱尔兰国民財富的增长情形。

1814年	55	十亿法郎
1865年	162 $\frac{1}{2}$	十亿法郎
1875年	212 $\frac{1}{2}$	十亿法郎

② 路·萊巴：《棉花，其制度，其問題》（1863年）。

IV

什么时候唱什么歌

假如在縮短工时时我們为社会生产創造出新的机械的力量，那末在强迫工人消費他們所生产的产品时，我們就使人类劳动力的大軍增加許多倍。那时摆脱了使自己成为总消費者这一任务的資產階級，赶快地解散軍隊、公務員、拉皮条者等等，使他們脫离开有益的劳动，好給自己創造消費和浪費的助手。劳动市場于是就有人滿之患；这就不得不頒布禁止劳动的法律，为这些迄今都是非生产的、比蝗虫还多的人群找到工作是不可能的。继他們之后还必须想到那些关心滿足自己的空虛的和浪費的需要和口味的人們。当不再有需要金銀边飾的將軍和仆役的时候；当不再有需要花边的已出嫁的和未出嫁的妓女的时候；当不再需要盖造宮殿和鑄炮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得不靠严格的法律的帮助迫使編織金銀边飾、花边的，鑄造大炮的，盖造宮殿的男工和女工练习划船和学习跳舞来恢复他們的健康和改善种族。当欧洲的商品只在本地消費，而不运送到鬼知道的地方去，那时候海員、装卸工和大車工就不得不沒有工作閑坐和餓死。

幸福的玻里尼西亚人，当他們不怕文明的維納斯的打击和欧洲道德的宣传的时候，便能放弃自由的爱恋。

还不仅如此，为了現代社会一切非生产的力量找到工作和为了使生产手段无限制地改善，工人階級应当像資產階級一样，把自己身上的节欲的习惯加以抑制并且把自己的消費能力发展到无限度。不是每日吃几克的硬肉，假如能吃到的話，他应当吃一磅或二磅的多汁的煎牛肉排；不是有节制地喝坏酒，比教皇本人更加信天主教，他将滿杯滿杯地喝真正的波尔多酒或布尔貢德酒，而把水給

牲畜去喝。

无产者坚持强使资本家接受矿山和工厂里的十小时工作，主要坏事就出在这里，这是社会对抗和內战的根源。不能强使接受，而需要禁止工作。罗特希尔德、塞雅以及其它的人可以证明，他们終生都是懶汉，而假如他们想继续过完全懶汉生活，尽管大家都迷恋劳动，他们将被登記在专门的名單上，每一个早晨从自己的小小的娱乐中得到二十个法郎。社会的紛爭就告熄灭。食利的资本家既然相信，他们不仅不想引起坏事，而相反地想从他们一生下地就命定承担的过度消費和浪費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于是急急忙忙地加入人民党。至于那些不能证明自己的懶汉称号之权的资产者，那就得允許他们遵循自己的本能；为他们找到足够的职业：杜孚打扫厕所，加利弗打扫生癬疥的猪和生鼻疽病的馬；被派到普阿西的委员会委員登記需要屠宰的犍牛和綿羊的数目；那些特別爱好盛大的葬礼的参議員去演奏葬礼进行曲。为其它的人也可找到适合他们的智慧能力的职业：洛日里尔、勃罗伊尔堵塞香檳酒瓶，但是得先给他们戴上口罩，以免被他们喝掉；費里、弗莱亚伊、吉拉尔消灭公共栖身之地的臭虫和一切骯髒之物；可是需要把钱藏得离开资产者远远的，以防止他们偷錢的习惯不改。

但是敗坏人类本性的道德家，装模做样欺騙人民的伪君子，假好人，都将长期地和重重地受到报复。在盛大的人民的节庆日子里，那时候，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将不是像在7月14日^①那样吃灰尘，而是痛飲美酒和吃美味的烤菜，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的成員，穿长袍和穿常礼服的教皇，經濟学的、天主教的、清教的、耶穌教的、信仰自由思想的教会的教皇，馬尔薩斯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和基督教道德的宣传家——所有他们都将身穿黃衣，手执蜡烛，

^①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7月14日人民群众攻破囚禁革命人民的巴士底獄。此后，这一天就成为法国人民的国庆日。——譯者注

在摆满了鲜肉、水果和香花的桌子周围因饥饿而痛苦，并在敞开的大桶旁边因口渴而死去。他们一年中有四次（在换季节的时候），将被关在风磨旁边，并强迫他们连续十小时去磨风。律师和法学家也得到同样的惩罚。

在懒惰的王国里，为了杀死那一秒一秒地杀死我们的时间，将组织戏剧和各种舞台演出；这正是适合我们的立法者的工作：把他们组织成许多小组，跑遍乡村和集市，到处作立法的演出。穿长靴、礼服和佩戴奖章的将军们将在街头和广场上跑来跑去，邀请好人来看演出。然后开始伟大的一幕：盗窃国民财富。

资本主义的法兰西，一个有多毛的脸和光秃的头的高大的妇女，发胖起来时又带有松软的皮肤和肥肿的身躯，还有无光泽的眼珠，躺在沙发上闭望；在她脚下的工业的资本主义，铁制的庞大机体，戴着猴子的假面具，机械地吞食男人、妇女和儿童，因而他们的撕裂灵魂的喊声就充满空气之中。带有貂的嘴脸、鬣狗的身躯、针鼹的指甲的银行动作迅速地从他的口袋里把钱一个一个偷走。在拿马刀的宪兵押送之下的不幸的、虚弱的、穿褴褛衣衫的无产阶级大军，被手拿饥饿的皮鞭抽打他们的福利雅女神^①追逐着，正是他们把各种各样成堆的商品、大桶大桶的酒、一袋一袋的粮食和金子投在资本主义法兰西的脚下。朗格洛亚，一只手拉紧裤子，另一只手里拿着普鲁东的遗言和行贿收入的清单，成为国家财产的保护人的首领。一当工人放下自己的担子，就用手杖和刺刀的打击来驱逐他们，于是就给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打开大门。他们毫无秩序地奔向这一大堆商品，抢夺物资、粮食口袋、金锭，倒空酒桶，最后当他们没有力气时，就连那些脏的、令人生厌的东西也倒空，他们于是陷在自己的垃圾里……这时响起雷声，土地裂开，而从中就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者注

跳出历史的“必然性”；它用自己的铁脚蹂躏一切擋在路上的人們，又用自己的强有力的手推翻因恐怖而发呆的資本主义的法兰西。

* * *

当工人階級，从自己心上拔去他們身上帶有并屈辱他們的坏毛病，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站起来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人权，那实际上只是資本主义剝削的权利，也不是为了要求劳动权，那只是貧困的权利，而是为了鍛造禁止人們一昼夜不超过三小时工作的铁的法律，这时候旧的土地，因快乐而顫抖，会感到一个新世界是怎样在它身上产生出来……但是如何期待被資本主义的道德敗坏了的无产階級作出勇敢的解答？

像耶穌这个古代奴役的悲哀的化身一样，我們的无产階級——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經在許多世紀中間帶着劳动登上苦难的蛾尔蛾他^①；在許多世紀中間苦役的劳动折断他們的骨头，杀害軀体和撕裂神經；在許多世紀中間饥饿撕破他們的內臟和使他們头晕……

啊，懶惰，可怜我們的貧困吧！啊，懶惰，艺术和高尚的美德的母亲，但願你成为人类苦难的鎮痛剂！

附 注

我們的道德家是非常謙虛的人；虽然他們想出了劳动的武断定理，可是他們总还是怀疑它能否安定灵魂，增加智慧，有助于腎臟和人的机体的其它器官的正确的功用；他們一开始就想在人民群眾中考驗它的影响，而不是拿它去反对資本家，因为他們为資本家的恶德作解释和作辯护。

① 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蒙难处。——譯者注

但是，廉价的哲学家，为什么当你们发明那不能向你们的统治者建议的道德时使自己的脑筋紧张呢？你们是否愿意看到你们洋洋得意地发明出来的劳动的武断定理是如何受到嘲笑和轻视？让我们打开古代人民的历史和他们的哲学家和立法者的著作。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我不能断定，对劳动的轻视，是否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因为在色雷斯人中，在波斯人中，在吕底亚人也发现同样的轻视，因此在大多数半开化人中间所有那些学习手艺的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被视为低等公民……所有希腊人，特别是斯巴达人，都是用这些原则教养起来的”^①。

“在雅典只有那些保护国家和管理它的公民才被认为是真正高尚的，正如他们所由发源的野蛮的战士中的情形一样。他们希望自由支配所有自己的时间，以便有可能把所有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都用在关心共和国的利益上面，于是就把所有工作都推给奴隶。因此在斯巴达人中间甚至连妇女也不必纺纱织布，为的是不失去自己的高尚身份”^②。

罗马人只知道两种自由的高尚的职业：种田和打仗；所有公民都有权靠国家生活，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靠某一种骯脏的技能（他们称之为手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为这些技能按权利来说是属于奴隶的。老布鲁特，为了唤醒人民，指责暴君塔尔基尼亚的主要罪状是他把自己的公民变成泥水匠和手艺人。^③

古代的哲学家争论着思想的起源，但是他们都同意否定劳动。柏拉图在自己的社会乌托邦里，在自己理想的共和国里说：“自然既没有创造鞋匠，也没有创造铁匠；类似的职业降低人们的尊严，即降低那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低微的雇工、无名的不幸者的尊

① 《希罗多德》，第二卷，拉雷译本，1786年。

② 比奥，《论西方古代奴隶制的废除》，1840年。

③ 《Tite Live》，第一卷。

严，他們由于自己所处的境遇甚至失掉政治的权利。至于說到喜欢撒謊和蒙騙的商人，那末将被当作必要的罪恶容忍在公社里。被商人屈辱了的公民将因这罪行而受到迫害。假如他是街头流浪者，那末将被监禁一年。假如重犯便要加倍处罰”①。

色諾芬在自己的經濟学中写道：“从事手工艺的人們任何时候也不能委以高等的职务，而这是完全公道的。他們的大多数被迫过着坐着的生活，其余的还受到經常的火的影響，——所有这一切自然不能不以有害的方式影响身体，也不能不影响头脑”。

西塞罗声称：“难道小鋪里能搞出什么好东西？难道商业真能做到老幼无欺嗎？凡是带着小鋪名称的一切都配不上高尚的人，因为商人倘不采取欺騙，便不能賺錢，而且难道有什么比欺騙更可耻的嗎？因此，人們借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产品的手工艺，应当被視為卑微的和下流的，因为誰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誰就出卖自己本人，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②。

被劳动的武断的定理愚弄的无产者，你們听見这些哲学家們关心地向你們隱瞞的話沒有？出卖劳动換錢的市民把自己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这就犯了罪，应受禁閉的处罰。

基督教的伪善行为和資本主义的实利主义还没有把古代共和国的这些哲学家引坏；当向自由人宣传的时候，他們就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思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我們的庫松、卡罗、西門同他們比簡直有天壤之別），希望在他們的理想共和国中公民享有很多的閑暇時間，色諾芬补充說，因为“工作夺去一切時間，因而在工作之外就沒有給共和国和朋友留下閑暇”。据普魯塔克說，李枯尔格这个最聪明的因而值得后代惊异的人，主张禁止共和国的公民从事手工艺而讓他們享有閑暇時間。

① 柏拉图：《共和国》，第四卷。

② 西塞罗：《論义务》，第一卷，第二篇，第五十二章。

巴斯夏、杜盤魯、波利埃以及資本主義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一切伙伴回答道：“但是這些哲學家是在宣傳奴隸制啊！”完全正確，在他們那個時候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之下，難道能有另外的出路嗎？戰爭是古代社會的正常狀況；自由人應當把自己的全部時間獻給國家大事的討論和保衛國家；手工藝當時是不發達的和粗糙的，從事手工藝的人們因而不能同時執行士兵和公民的義務。為了擁有士兵和公民立法者，哲學家應當在自己的英雄的共和國里容忍奴役。但是資本主義的道德家和經濟學家不是宣傳僱傭勞動，現代的奴隸制嗎？資本主義的奴隸制給他們創造閑暇時間的那些人們又是誰呢？羅特希爾德、謝萊德、布西柯太太。所有這些都是無益的和甚至有害的人們，自己的惡德和自己的仆役的奴隸。

某些人鄙夷地說：“奴隸制的偏見統治了畢達哥拉斯和亞里士多德的頭腦”，然而亞里士多德已經預見到“假如每種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按照自己的愛好執行它所特有的工作，像底德洛斯的創造那樣會自己運動或者像赫菲斯特的三腳供桌那樣會自動地去做祭祀的工作，——假如織布梭也同樣會自己織布，那末師傅就不需要助手，而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隸了”。亞里士多德的夢想現在已經實現。我們的帶有火力發動的，帶有不知疲倦的鋼的肢體，帶有驚奇的生產力的機器馴服地自己完成自己的勞動，而資本主義偉大哲學家的天才却仍然像以前一樣受着僱傭勞動，最壞的奴隸制的偏見的統治。他們還不理解機器是人的濟困扶危者，是把人從骯髒的手藝和僱傭勞動中解放出來的上帝，是給他閑暇和自由的上帝。